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练月琴

副主任 唐旭明 魏晓蕾 彭慧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孙波 任世红 陈思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薛兵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任世红

目 录

2018年 第1期 总第111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王 芳
责任编辑:鲍跃华 王 芳 龚万达 郭晓东

习近平统一战线思想研究

以统战思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习近平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思想研究 / 杨卫敏 04

统战理论与实践

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

——新媒介环境下凝聚文化共识的新路径 / 吉 强 18

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价值功能探析 / 常 婧 25

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难题与对策

——贯彻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条例》的思考 / 李梅香 29

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创新研究 / 曾土花 36

新的社会阶层

自由职业青年的生存现状、群体特征及对策建议 / 廉 思 4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案例的分析 /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48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网 址: <http://JSYB.chinajournal.ner.cn>

电子邮箱: jssyxb@163.com

电 话:025-84287236

传 真:025-84287236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非公经济

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调查与分析

——以上海市 S 区为例 / 王俊华 郑佐华 狄正华

5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的探讨与建构 / 韩 阳

64

学习与思考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的综合素养 / 朱 虹

70

干部培训在增强文化自信中的作用调查及分析 / 侯 丹

74

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

——以中国足球为例 / 龚智敏 张 彦

78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2 * 2018 - 02

以统战思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习近平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思想研究

杨卫敏

摘要:习近平从地方工作直到担任总书记后的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论述,始终贯穿着统战理念和统战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特就特在它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统一战线目标要求和评判标准谋划宗教工作、以统一战线理念和方法开展宗教工作、统一战线五大关系中的宗教关系和谐、统一战线领导权在宗教工作中如何实现等。习近平首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彰显了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有机结合,一般公共事务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国家治理与团结联合的有机结合。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中的统战思维,是我国成为全世界处理宗教问题最为成功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基本经验,也为世界提供了处理和解决古老而棘手的宗教问题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显著标识。当前,面对国际国内新的机遇和挑战,宗教工作要树立“情、理、利、文、法”五位一体的统战思维。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牢固树立统战理念,画出最大同心圆,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宗教问题;统战思维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1-00004-14

习近平 2016 年 4 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外延及其构建,是目前学界、政界和宗教界都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问题^①。实际上,习近平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是有着长期的实践积累和深层的战略思考的,有着基本的构想脉络。习近平从地方工作直到担任总书记后的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论述,始终贯穿着一条主

线——统一战线,就是以党的统一战线的站位、目标、理念、方式看待宗教问题、对待信教群众、部署宗教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目前学者专家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对“统战思维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关注并有所论及^②,但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述尚缺。本文试从统一战线角度,对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思想作一粗浅的探

收稿日期:2017-12-19

作者简介:杨卫敏(1965-),男,浙江台州人,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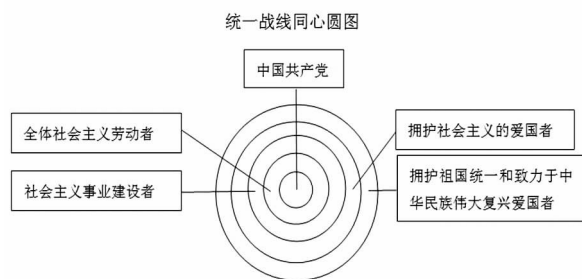
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特就特在它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宗教篇,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宗教问题是世界性的古老而复杂的问题。宗教学是个古老的学科,目前全世界有很多机构和学者、教职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在研究它。在我国,宗教学属于国家一级学科。毫无疑问,宗教工作理论应是宗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理论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但目前尚未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呼声较高的“统战学”还没有列入二级学科目录。但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必须明确,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对台工作、侨务工作都是统一战线工作”。当前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论述,既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宗教篇,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二)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构成统一战线同心圆中的重要一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早在1997年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习近平就指出:“我们怎么估价各宗教的教徒信众?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爱国者。我们党的政策是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巩固和扩大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只要把政治底线这一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的半径越大,画出的最大同心圆就越大。长期以来,在统一战线同心圆中,“拥护社会主

义的爱国者”这一环指的是哪几类统一战线成员并不十分明确(如图所示)。笔者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战线史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主要是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被赎买的原工商业者。他们作为食利阶层,不是劳动者,但仍然可以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现在,这部分人越来越少,《条例》对其已经不再单列。笔者认为,当下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主要是指宗教界爱国人士及其所联系的信教群众^③。这是因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宗教的根本方向,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也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如何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和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统一战线理论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宗教领域是统一战线的热点地带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宗教理论都在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论述,开辟了统一战线理论新境界。宗教关系是统一战线五大关系的重要方面,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占有很重的位置。早在1999年福建省委副书记任上,习近平就指出,宗教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复杂的现象,要加强对宗教政策的研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才能团结大多数^[2]。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强调宗教工作是浙江统战工作的难点。习近平提出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加强了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部署和检查宗教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及时

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民族宗教工作的思路和办法。统战部门要加强对民族宗教方面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协调，政府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要依法加强对民族宗教事务的管理，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民族宗教工作^[4]。十多年来，浙江省各地探索有效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特别是开启了宗教活动场所财务代理制度和民间信仰场所规范化管理等创新性工作。近几年来，如何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成员，如何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等，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共同关注和重点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于宗教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研究和把握宗教工作规律对做好宗教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5]。习近平要求在贯彻宗教政策的基本要求、关键环节、重点举措等方面，做到“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6]，有效杜绝因工作方法失当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既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要结合各宗教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以做好重点工作推进全局工作^[7]。当前，宗教工作规律是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创新需要探究的重大课题。要建立专门的研究队伍，探索建立宗教工作智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宗教问题等的研究，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新境界^[8]。

二、以统一战线目标要求和评判标准谋划宗教工作

(一)最大政治与全局工作。毛泽东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过，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党的十

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他进而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9]。习近平一直认为，宗教工作是事关党和政府全局的工作。还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任上，就多次指出：“不懂得宗教问题，不懂得宗教发展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中产生的作用，不懂得宗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是无知的表现”；“宗教问题并不是个小问题，决不能有一点麻痹。宗教问题处理不好，要出大事，不仅有被渗透被演变的可能性，还会造成国家的分裂”；“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信仰，也是一种社会实体，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将转化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2004 年 4 月，习近平在浙江全省宗教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指出，“宗教工作是一个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10]。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11]。

习近平之所以把宗教工作视作全局性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基于对宗教的群众性的深刻认识。早在 2002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就指出：“宗教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有着相当群众基础。”^[12]2004 年 4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宗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13]同时指出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揭示了宗教工作的本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等多个场合说过，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14]。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信教群众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在宗教工作

中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要站在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高度,站在整个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站在党和政府全局工作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

(二)政治底线与法律底线。党的十八大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多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9]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政治底线的含义: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强调“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在宗教领域,习近平突出法律底线,强调必须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10]。

习近平提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强调必须区分合法宗教活动与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活动。早在1997年4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严格划清爱国宗教团体与非法宗教组织界限,正常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界限以及宗教、民间信仰、封建迷信三者之间的界限。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各种非法宗教组织,坚决刹住滥建庙宇和佛(神)像之风,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管理,并妥善解决落实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1]。同年11月,习近平在走访福建省各宗教团体时指出,宗教管理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要依法支持、保护宗教团体的正当活动,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加强对宣传教育、综合治理,制止非法宗教活动^[12]。党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对属于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要依法处理”^[13];“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主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14];“渗透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我争夺宗教工作领导权,争夺群众。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15]。习近平洞若观火地指出,“我们与达赖分裂集团斗争的焦点,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更不是所谓的人权问题。我们与达赖分裂集团斗争的核心与实质,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原则问题”^[15]。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完善涉及宗教的法律法规。早在2002年3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上,时任省长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进程。加快我省地方性宗教法规的立法步伐,使宗教事务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6]。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于2006年3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17]。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宗教方面的一般性社会事务,要通过国家一般性的法律法规来调节规范,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宗教方面的具体问题,要通过修订完善《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规章解决,社会其他领域制定法律法规时要考虑和涵盖宗教的相关内容。同时要研究完善有关具体政策,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适时上升为法律,努力实现政策与法律的衔接配合。2017年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主要着眼六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两维护”“两明确”“两规范”。两维护,即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两明确,即明确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和宗教财产权属、明确遏制宗教商业化倾向。两规范,即规范宗教界财务管理、规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

民间信仰在我国东南沿海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管理部门,其活动易产生乱象。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民间信仰要纳入管理,不要酿成大乱”;“宗教工作部门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要研究、分析,提出政策意见,然后分工管理。强调要加强对民间信仰的引导和管理,将之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2]。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继续以此进行倡导,后来浙江在试点基础上率先出台民间信仰场所管理服务办法,为在全国范围内出台相关法规政策提供了经验。

(三)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好统战和宗教工作。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和我国国际战略的推进,统一战线涉及的国际、国内因素错综复杂,必须要统筹国际国内大局进行谋划。宗教的国际性决定了宗教工作这种统筹更显紧迫。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已关注到义乌国际商贸城面临涉外宗教问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以全球视野和战略视角把握宗教、民族等统一战线工作与国家安全之关系。他指出,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18]。针对境内外“三股势力”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习近平提出要并行推进国内国际两条战线,防范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肆意蔓延。

(四)网络统战工作与互联网宗教问题。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统一战线从党内党外、体制内外、海内海外进一步拓展到网上网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空间已成为统一战线大陆和港澳台海外之外的第三个范围。习近平提出要积极探索“网络统战”^[19],强调“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19]。互联网和信息化,也加剧了宗教的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有关数据显示,2001年互联网上涉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文网站、网页仅7100多个;2015年1月,约为2740万个。习近平要求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

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指出网络宗教是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部门的综合性问题,政府、宗教团体和社会大众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网络宗教的秩序与良性运行,需要各方共同发力^[9]。

(五)判断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统战工作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多不多是数量问题,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是质量问题。”我国广大信教群众同样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的评判标准,与统战工作做得好不好的评判标准一样,都在于是否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否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指出,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既尊重群众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尊重群众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深刻认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指出“宗教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社会意识,但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力量,涉及到亿万信教群众。境外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变为同党和政府对抗的力量”^[5];指出“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20];指出“如果对信教群众不尊重、不信任,我们党就失去了一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5]。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尊重信教群众的基本信仰,团结好信教群众,把能不能将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作为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宗教工作的本质,明确了评价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指明了宗教工作的着力

方向。

三、以统一战线理念和方法开展宗教工作

(一)一致性与多样性。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明确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这是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创新。正确把握和贯彻这一方针十分重要,一方面要着力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增进一致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和引导多样性。要通过耐心细致的统战工作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与宗教信仰者能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认识是一脉相承、接续发展的。周恩来早就指出:“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都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21]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也多有论述,指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应成为各宗教界团体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22]。“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信仰上的差异性,绝不能把这种信仰上的差异引导到政治上去”^[23]“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23]。

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仰者来说,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5]。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人士“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就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5]。

(二)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统一战线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统战工作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这方面,毛泽东不但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更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

得少少的”,还说过“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24]。

对如何对待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多有论及。例如,他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继续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努力化解不利条件和消极因素”^[4]。要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阐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5]。要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26]。要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的独特作用。”^[26]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充分肯定宗教界对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2014年5月4日在听取3位伊斯兰教代表人士和1位佛教代表人士发言后,习近平表示,“作为一种文化,我很注意看宗教方面的著作,宗教在劝人向善方面有很多智慧,有很多有益的阐释”^[20]。2015年6月,习近平在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时,就高度赞扬了藏传佛教教义中的扬善惩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积极思想以及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既不能只注重抑制消极因素、忽视调动积极因素,也不能只注重调动积极因素、忽视抑制消极因素”、“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不是要把宗教当作济世良方、人为助长宗教热,而是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6]。

关于宗教具体有哪些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明确指出宗教可以“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6],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27]。习近平特别指出宗教和谐对两岸和谐的重大意义,专门提到福建浙江的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在两岸交往交流中的作用,指出“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28]。

(三)最大公约数与宗教中国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讲到要寻求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29]。在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 13 亿多人口、56 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30]。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当前我国处理宗教问题和开展宗教工作的最大公约数。

我国宗教中国化永远是进行时。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我国各宗教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地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又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伦理思想、礼仪制度、风俗习惯,“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31]。

习近平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32]。他在主政上海时就指出,宗教界要“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鼓励广大信教

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26]。只有通过落实“宗教中国化”,才能做到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才能真正称得上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四)去行政化与导之有方。统一战线既是我们党的执政资源也是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其政治优势就在于能够在行政手段之外通过党的向心力、感召力、影响力来凝心聚力,因此统战工作最忌行政化,要有人情味,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通过“做功夫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33]。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方面,宗教工作涉及群众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反复证明,凡属思想认识的问题,特别是群众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用强制式、运动式的方法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适得其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他认为,对于宗教信仰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要善于引导和启发。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今天推进宗教中国化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际上,反对用行政手段去发展宗教或消灭宗教,这是习近平一贯的主张。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就指出:“有的地方提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目的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信仰。在旅游点塑一个佛像,然后就开香火,这些跟我们宗教政策是不相吻合的”^[32]。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以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宗教问题所具有的特殊复杂性,对宗教工作必须锲而不舍、深入细致、反复耐心,既不能操之过急、跨越阶段,也不能当办不办、畏缩不前^[33]。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分析了两种片面的态度,即“放”和“收”。一种是对宗教主张“放”的态度,忽视了宗教背后包含的复杂社会政治因素,甚至赋予宗教一些本身没有也不应该有的社会功能,因而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正确的。强调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

济和繁荣文化的名义助长宗教热。另一种是对宗教主张“收”的态度,忽视了宗教是一种客观存在,忽视了信教群众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夸大了宗教的消极作用,因而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正确的。强调必须牢记,对宗教信仰不能用行政力量、用斗争方法去消灭。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关于如何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四条原则,即: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34]。实际上,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指出,要与时俱进,认真处理好传统与时代、继承与发展、教情与国情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思路和方式^[35]。在谈到藏传佛教工作时他指出,要发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传统,推进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36]。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明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和目的: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37]。

(五) 照顾同盟者利益与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项政策优势和优良传统,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优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习近平就说过:财政虽然困难,也要拿点

钱出来帮助宗教界解决一些问题。2014年4月他在新疆调研时,指出要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2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利益调整对照顾同盟者利益这一传统原则提出新的挑战,要求在执行相关政策过程中既能体现党的政策又合法合规合理,特别是要处理好个人与国家、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关系,自觉融入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中。早在1993年9月27日,时任福建省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市宗教界人士代表中秋节座谈会上谈到拆建工作时指出,既要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又要维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要求有关部门事先做好说明,并做好补偿工作,纠正侵犯宗教团体合法权益的现象;同时也希望宗教界各团体在协调解决此类问题过程中,能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城市建设。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真心实意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努力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党和政府对信教群众的凝聚力^[38]。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与时俱进地提出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39]。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团结好信教群众,就要善于运用群众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开展工作,关心信教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信教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40]。

(六) “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统一战线包罗万象,统战工作不能包打天下。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都明确指出,统一战线的重点是党外代表人士。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通过做代表人士的工作来影响和带领其背后联系群众的工作,也就是毛泽东讲过的“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的关系。

宗教界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六支队伍的重要一路,人才培养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关键

问题。宗教界人士作为信教群众信仰上的引领者,深刻影响着信教群众,影响着宗教的面貌和健康发展。习近平曾勉励第十一世班禅“刻苦学习、努力修行……努力成为一位具有精深佛学造诣和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35]。目前我国宗教教职人员已从新中国成立初的 6 万人发展到 36 万余人,其中不乏爱国爱教、年富力强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所谓的“松土工程”“金字塔工程”“断桥工程”,与我争夺宗教界代表人士和信教群众,其目的是要割断党和政府与宗教界人士的联系沟通。加强宗教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一个战略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指出,人才培养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要让桥梁变成断桥,使纽带成了飘带^[5]。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标准,就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34]。同时明确提出了高素质宗教团体领导班子的标准,就是“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指出加强宗教人才培养是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宗教团体的重要职责。要求宗教团体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培养人才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四、统一战线五大关系中的宗教关系和谐

协调关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职能。统一战线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要协调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这五大关系既是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也是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政治社会关系,统一战线的重要目标就是要以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和谐促进整个社会和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的主要领导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多有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些论述思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全面系统阐释了宗教关系的内涵,明确了处理宗教关系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明确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强调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这一新的理论有着深刻的含义,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宗教工作明确了方向和抓手。

(一)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核心是处理好政教关系。政教关系从来就是处理宗教关系的核心关系,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时曾要求积极引导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保持同心同德、同舟共济^[29]。习近平在 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同宗教界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坚持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等职能实施,政府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宗教事务。

(二)在处理社会与宗教关系上,坚持宗教是社会的一部分,宗教要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就要求各宗教“继续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弘扬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和谐之风,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26]。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34]。

(三)在处理国内不同宗教关系上,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和睦相处。长期以来对我国五大宗教之间的关系鲜有论述,只是明确了全面贯彻宗教自由政策,包括既可以信仰这个宗教也可以信仰那个宗教。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提到了“要维护不同宗教之间与宗教内部的团结”^[26]。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和睦共处,各宗教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都有履行我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四)在处理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关系上,既

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又支持正常的对外交往。我国宗教同外国宗教不存在隶属关系,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早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强调,经济、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涉外等部门,在与外国进行交往交流时,要坚持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同国外机构或人签约时,不能带有宗教内容的条件,并自觉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36]。要加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工作,把抵御渗透与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与解决信教群众的实际困难相结合,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形成宗教界、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共同抵御渗透的局面^[25]。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重申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但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支持和鼓励国内宗教与国外宗教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推动不同宗教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早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要求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同宗教界的正常对外交往活动区别开来,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25]。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强调从古老的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中挖掘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之间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启示,以积极乐观的姿态与沿线国家一起,携手建设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37]。习近平还指出,我国正在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沿途有26个国家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做好伊斯兰教工作,对促进交流合作具有积极意义^[9]。习近平特别指出“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38]。

(五)在处理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关系上,要促进彼此尊重、和谐相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是我国公民,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思想上、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同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地方期间习近平就提出,要努力促进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和睦相处^[26]。要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

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和谐相处^[25]。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事实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关键在“全面”两个字上理解,即:我国公民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可以今天信仰宗教明天不信仰宗教也可以今天不信仰宗教而明天信仰宗教。而不可片面理解或各执一端。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对处理我国宗教关系还专门强调必须把握以下三条原则:一是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二是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三是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这三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求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和开展宗教工作中,要贯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特点和优点。

五、统一战线领导权在宗教工作中如何实现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历来是根本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统一战线和宗教涉及党内与党外、体制内外、海内海外以及地上地下、网上网下,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为增强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提升党的领导和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发挥独特作用。

(一)突出政治领导,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让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认同党的路

线和目标并为之共同奋斗。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就一直认为,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和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掌握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36]。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34]。

值得注意的,习近平讲的这种“政治领导”,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习近平的一贯思想。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期,福州市两次召开全市宗教工作会议,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均亲自到会讲话。他强调,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加强,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倡导无神论。党和政府、任何个人都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1999 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指出,我们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既要讲宗教信仰自由,也要强调宣传无神论。要切实纠正一些地方存在的忽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不良倾向^②。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不懈、理直气壮地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3]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中的主导地位。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而且还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⑤。

(二)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但要巩固和壮大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多次强调: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党的意识要最强;越是做党外工作越是要心中有党。这一思想体现在宗教工作中,实际上就是“谁统谁”的问题。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期,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时,就要求“组织部门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党的基本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帮助广大党员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严肃党的纪律,把解决党员信教问题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宣传部门要坚持抓好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重点是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宗教观,既懂政策又会管理”^[36]。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但同时明确指出“做群众工作不能都是一团和气,不能搞成无原则的团结。做群众工作是带领群众前进,而不是做群众尾巴”^[5]。要特别强调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一政治纪律;还要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共产党员当然要坚持无神论,不坚持无神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也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了。

在此前提下,要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5]。

(三)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和人才培养,确保爱国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实际上,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十分重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1997 年 9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与省级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代表和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

办好教务^[32]。主政浙江时,习近平指出,要大力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3]。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搞好宗教团体接班人的培养工作。早在地方工作时他就指出:“做好宗教界接班人的培养工作,是整个宗教事业发展的头等重要的事情,关系到老一代宗教界爱国人士开办的爱国爱教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大问题”^[2]。要求各宗教团体要有长远眼光和现实紧迫感,继续抓紧培养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能联系信教群众的年轻宗教教职人员。强调“老一辈宗教界领导人,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成长起来的,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加强培养,无论是在政治素质方面,还是在学养方面都要进行培养”^[32]。要求各级统战、宗教工作部门也要把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宗教界接班人培养工作顺利开展。

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方式开展工作,发挥好宗教团体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好宗教人士联系和服务信教群众的作用^[9]。强调“团结好信教群众,不能都是一团和气,不能搞无原则的团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使他们自觉团结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5]。

(四)充分发挥两个领导小组和大统战工作机制的作用,明确统战部门和宗教工作部门在宗教工作中的职责。习近平一贯认为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的全局工作。因此,在地方工作时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统战、宗教及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齐抓共管、分工合作,共同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3]。他主政福州时要求市、县两级党校要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理论和政策列入教学课程,作为必修的一课。要对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进行系统的宗教理论、政策教育,提高各级党政干部的宗教理论、政策水平。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是统战工作第一责任人^[6];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宗教工作第一责任人^[9]。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处理宗教问题能力,把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推动落实宗教工作决策部署。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做好对宗教工作的引领、规划、指导、督查。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发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建立并发挥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的作用。明确在宗教工作中,党委统战部要切实承担牵头协调的职责,政府宗教工作部门要担负起依法管理责任,有关部门及人民团体要齐抓共管,共同做好宗教工作。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宗教工作任务重的地方基层组织,要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工作。要健全基层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强化两级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化的大统战大宗教工作机制。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上强、能力上强、作风上强”的高素质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尤其是要确保县级政府宗教工作机构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和基本人员编制。

六、结语

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国际性,中国解决宗教问题的总体成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宗教工作中的统战思维,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宗教工作的特色,也是中国宗教工作的优势。一是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使宗教工作不仅是政府的一种依法管理,更使执政党从政府外展现领导能力、实现政治领导,包括:思想引领、人才培养、团结联谊和广交深交宗教界代表人士和朋友等等,从而融依法管理与政治引领于一体,实现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相统一;二是统一战线具有的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理念方式,有利于促进宗教各方面关系和谐;三是统一战线具有的组织网络和联系广泛的优势,有利于形成共同做好宗教工作的社会化机制,实现最大限度地信教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宗教理论和宗教工

作中的统战思维,是我国成为全世界处理宗教问题最为成功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基本经验,也为世界提供了处理和解决古老而棘手的宗教问题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显著标识。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立足“两个一百年”目标,用统战思维看待宗教和开展宗教工作,用统战思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念,要落脚到“情、理、利、文、法”五位一体的方法论上。情,就是与宗教界人士交朋友,通过他们影响和引领广大信教群众;理,就是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宗教工作,引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利,就是关心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实际困难,在帮助解决问题中增进感情;文,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引领和促进宗教中国化;法,就是要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提高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守法自觉性,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五位一体”反映了习近平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人心与文化、经济与政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辩证思维,融和谐统战、经济统战、法理统战、文化统战于一体,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

统战工作不是权宜之计,更不只是工具和手段,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事关“最大政治”。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牵涉各种关系,任务十分繁重,大量具体工作行政化、事务化无可厚非,但必须牢记和贯穿主线和灵魂——统战理念和方法于其中。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牢固树立统战理念,突出战略地位,纳入全局工作,巩固和壮大党同宗教人士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越是做党外工作越是要心中有党。同样,宗教工作必须强化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统战意识。当前在宗教工作具体事务中,要力戒单纯事务和行政工作的倾向,努力做到行政性、事务性与政治性、统战性并举,寓政治性、统战性于行政性、事

务性工作中,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应成为新时期宗教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共识,也是进一步构建、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必由之路。

注释:

- ①主要文章有叶小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如何布局》,《人民论坛》,2016(25):6-8;叶小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内涵及外延》,《世界宗教研究》2016(3):1-4;叶小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求是》2016年第17期;何虎生、刘福军、张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内涵》,《科学社会主义》,2016(3):4-9;刘福军:《从比较视角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特色内涵》,《世界宗教文化》,2016(6):27-33;曾传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的意义》,《宗教学研究》,2016(4):8-11;何虎生、张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的层次、内涵及特点》,《世界宗教文化》2017(3):6-11;刘福军:《从比较视角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何虎生、王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马玉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5):40-44;牟钟鉴:《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学者的神圣使命》,《中国宗教》,2016(5):33-35;曾传辉:《深入系统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术研究》,《中国宗教》,2017(6):31-33;谭立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若干思考》,《中国宗教》,2017(6):34-35;等等。
- ②参见:卓新平:《用大统战的思维协调好与宗教关联的各种关系》,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4-26 光明网-理论频道转载 http://theory.gmw.cn/2016-04/26/content_19859588.htm;卓新平:《践行统战实践 做好宗教工作》,中国民族报 2017年08月15日第6版;蒲长春:《以统战思维推进宗教工作》,中国民族报 2017-08-15第6版;王冬丽、白文汇:《用统战思维看待宗教》,中国民族报 2017-08-15第6版;张祎娜:《以统战思维看待宗教问题之我见》,《中国民族报》2017年8月22日第6版;马萍:《运用统战思维做好新形势下的湖北宗教工作》,中国民族报 2017-08-22第6版;汪茂铸:《运用统战思维指导和开展宗教工作的广州做法》,《中国民族报》2017年8月29日第6版;邱世勇:《邢台:用统战思维对待宗教工作》,《中国民族报》2017年8月29日第6版。
- ③宗教界爱国人士属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应没有疑问的。信教群众涉及面很广,可能涵盖劳动者、建设者和两个爱国者,很难界定;但大陆范围内的信教群众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应拥护社会主义,爱国爱教、守法敬业,所以全部归类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应没有问题,这也体现了从广

义上讲外环涵盖内环的同心圆法则(即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只要把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大,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

参考文献:

- [1][32] 省领导与省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习近平讲话[N].福建日报,1997-09-06(1).
- [2] 习近平.认清形势 扎实工作 巩固和发展统战工作大好局面——在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J].福建统一战线,1999(1).
- [3] 马跃.全省宗教工作座谈会在杭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J].浙江统战,2004(3):1.
- [4] 习近平调研省级宗教团体[J].浙江统战,2004(3):13.
- [5]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 [N].人民日报,2016-04-24(1).
- [6]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 [7] 陈红星等. 努力做好新世纪初的福建宗教工作——访福建省省长习近平[J].中国宗教,2002(4):20.
- [8]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实践[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262-263.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80-181.
- [10][34] 同[5][6],其中20字方针中的“遏制极端”是习近平2014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的。
- [11] 罗庆春.全面贯彻宗教政策 切实做好宗教工作[N].福建日报,1997-04-10(1).
- [12] 罗庆春.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N].福建日报,1997-11-20(1).
- [13]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1).
- [14]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为实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N].人民日报,2014-04-27(1).
- [15] 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N].人民日报,2015-08-26(1).
- [16] 罗庆春.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 宋德福习近平讲话[N].福建日报,2002-03-24(1).
- [17] 浙江统一战线年鉴(2007)[M].杭州出版社,2007:473.
- [18] 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N].人民日报,2015-08-26(1).
- [19]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2).
- [2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2014年4月27日至30日) [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384564>
- [21]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人民出版社,1987:383-384.
- [22] 习近平出席福州市宗教界人士代表中秋节座谈会并讲话[N].福州日报,1993-09-28(1).
- [23]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2.
- [25] 浙江统一战线年鉴(2007)[M].杭州出版社,2007:426.
- [26] 习近平.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N].东方早报,2007-08-17(1).
- [27]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1).
- [28] 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4-02-19(1).
- [29] 杨卫敏.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8(3):3-7.
- [30]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 [3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演讲 [N]. 人民日报,2014-03-28(1).
- [33] 浙江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从“冷”“热”两条线谋划统战工作——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有关统战工作重要论述和思想研究[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8(4):3-11.
- [35] 习近平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时讲话[N].人民日报,2015-06-10(1).
- [36] 市宗教工作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讲话 [N]. 福州日报,1993-08-18(1).
- [3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8.
- [38]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EB/OL]. (2017-05-1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编辑:王芳

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

——新媒介环境下凝聚文化共识的新路径

吉 强

摘 要:在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中凝聚文化共识,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但是,在新媒介环境下,网络传播“圈子化”的负效应制造了主流文化扩散、认同的障碍,成为凝聚文化共识面临的新的主要挑战。在此情形下,文化共识“如何凝聚”,应依循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的重要论断,于统战工作实践与互联网规律的深度融合中寻求应对之策。基于此,需要以网络传播的“关系传播”为基础,利用互联网的“互联”推动统战工作关系资源的“互联网+”转化,形成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的凝聚文化共识的新路径。

关键词:统战关系传播网;新媒介;文化共识;网络统战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8)01-00018-07

在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中凝聚文化共识,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但是,新媒介环境下凝聚文化共识正面临着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的困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1]面对互联网“最大变量”的困扰,文化共识“如何凝聚”,应依循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在统战工作实践与互联网规律的深度融合中寻求有效应对新路径,以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法宝作用。

一、新媒介环境下凝聚文化共识面临的新的主要挑战:网络传播“圈子化”负效应

一个社会的文化共识,体现为对这个社会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其中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可理解为在多重文化心理和多元文化结构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沟通、协商、引导等,不断增进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使他们就主流文化形成稳固的一致意见或共同看法,进而在文化的多样性中打牢一致性的基础。

凝聚文化共识依赖传播,即在主流文化的扩散

收稿日期:2017-12-04

作者简介:吉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文化联络处干部。

和认识框架重构方面离不开传播活动。在新媒介环境下,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介机构的大众传播垄断,并成为连通线上与线下的主流性传播活动,因而成为社会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也是新媒介环境下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的应然选择。这是因为互联网引发了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方式方法的变革;同时,全党的互联网工作需要统战工作主动参与。可以说,网络传播是新媒介环境下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的关键性因素。

Web2.0阶段,网络传播更具“圈子化”。而互联网对凝聚文化共识的“最大变量”主要体现在:网络传播“圈子化”的负效应制造了主流文化扩散、认同和文化间对话沟通的圈子障碍。这成为新媒介环境下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新的主要挑战。

(一)网络传播趋于“圈子化”

Web2.0技术极大满足了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改造了人与人关系的连接,构建出丰富的线上圈子,由此形成了“圈子化”传播趋势。

1.网络传播“圈子化”的成因。基于社会交往的内在需求,人们会结成各种圈子。互联网的“互联”不仅能够消弭线下圈子维系的时空障碍,引发线下各种圈子纷纷向线上延伸;又能突破线下的社会区隔,满足新的社交需求,产生众多异质性的线上兴趣或话题圈子;而且又在不断地对线下延伸而来的圈子和线上新建的圈子进行重构与再造。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传播赋权意味着任何个人和非媒介机构的组织都可成为传播主体。而他们在Web2.0阶段通常处于一定的线上圈子中自主传播信息。信息更多地是在圈内和圈间流动。

2.网络传播“圈子化”的基本形态。从圈内圈间和线上线下两个维度,可把网络传播“圈子化”的基本形态划分为三类。一是线上圈内传播,即信息在一个圈子内部各个传播主体间传递与互动。这种传播基于圈内主体间较强的人际关系,容易达成圈内共识。二是线上圈间传播,即一定圈子内的信息经过圈子间的连接,能够在网络空间更广泛地扩散。三是线上——线下圈间传播,即信息通过

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在不同的线上与线下圈子间扩散。这使得网络传播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连通,具有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3.凝聚文化共识需借助“圈子化”传播。尽管“广播”式(线性的广泛“散播”)的网络传播依然存在,但基于社交需求而糅合了圈内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圈间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的“圈子化”传播已日渐盛行。“广播”式传播的信息只有进入“圈子化”空间才可能更具效用。同时网络传播因线上——线下圈间连接,能够实现信息在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流动,扩散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因此,凝聚文化共识对网络传播的借助,需要依靠“圈子化”传播取得实际效果。

(二)网络传播“圈子化”负效应阻碍文化共识的凝聚

在网络传播“圈子化”的过程中,非主流文化的线上圈内“群体极化”和圈间传播共振,不仅容易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不断扩大不同文化间的距离,也会增强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博弈的能力。这给在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中有效传播主流文化、更好凝聚文化共识制造了新的障碍。

1.非主流文化线上圈内“群体极化”易加剧圈子间分化、分裂。圈子通常由“志趣相投”的人自发组成,有着大致相似的立场或观点。这容易导致网络传播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即经过圈内的交流讨论,大家“通常到最后所采取的立场,与讨论前成员所持有的倾向总体相同,而且更为极端”。^[3]“群体极化”一旦产生,线上圈子便成为一个“信息茧房: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4]圈内声音被不断放大,圈内的文化认识框架被逐步固化,形成较为稳定的圈内共识,并产生较强的圈子自我把关的信息过滤机制,强化了圈子的边界。其结果会在微观层次导致多样化的异质圈子更加分化、分裂,造成不同群体间文化沟通与理解的障碍,不仅阻碍了主流文化在线上非主流文化圈子中的扩散,也降低了异质圈子间通过对话达成文化共识的可能性。

2.非主流文化的圈间传播共振易产生文化“巴

尔干化”。在新媒介环境下,形形色色的碎片化的非主流文化能够经过网络传播的圈间互联在对应的“志趣相投”的线上圈子中流动、聚合,甚至能够利用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绕过技术或法律的“防火墙”在线上与线下实现串联,形成圈子间传播共振,产生“病毒式”的传播效果。这让非主流文化可以获得与主流文化相抗衡的扩散力量,并且拥有构建文化认识“主流”框架的能量。如果圈间传播共振持续不断或经常发生,微观层次分散、分化、分裂的异质圈子便会在宏观层次实现按类整合。这容易导致文化的“巴尔干化”:整个社会的文化“进入一种碎片或分裂的过程,相互之间经常处于敌意和不合作状态”,^[9]进而造成更大范围的文化分化、分裂。

3. 非主流文化的圈间传播共振易致文化娱乐化流行。值得注意的是非主流文化会体现为更具吸引力且渗透性更强的娱乐化文化。在圈间传播共振作用下,非主流文化的娱乐化容易在网络空间乃至整个社会空间蔓延而趋向流行,出现“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10]的现象。这容易导致主流文化在意识形态、理想信念、道德观念等精神理念层次被娱乐化所涣散。

由上所述,非主流文化线上圈内“群体极化”和圈间传播共振,对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接触、选择直至认同主流文化,对他们中不同文化的沟通、对话、协商等均会形成干扰或冲击,亦能提升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博弈的能力,从而容易削弱文化的一致性基础。这种“圈子化”的负效应成为新媒介环境下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面临的新的主要挑战。

(三)现有网络传播工作路径应对“圈子化”负效应的局限

近年来,统战工作愈发重视互联网的运用。就传播实践而言,这些工作侧重在内容和平台建设方面,体现为“内容传播”和“平台传播”的工作路径。但仅依靠这两条路径较难应对“圈子化”负效应。

1. 现有工作路径实为传统媒介环境下传播路

径的延续。在新媒介环境下,统战工作借助互联网凝聚文化共识离不开内容和平台(渠道)的支撑,形成了“内容传播”和“平台传播”两条工作路径。但是,它们只是传统媒介环境下“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的延续。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媒介机构的大众传播活动均是围绕“5W”模式,基于“信息传递”而展开。由此,“内容为王”,即“生产内容→满足用户信息需求→影响用户”;“渠道为王”,即“信息→渠道→影响用户”,成为媒介机构凝聚文化共识的依赖路径。

在新媒介环境下,以内容吸引注意力,即“内容传播”,以平台(互联网载体及其物理连接的“管道”)汇聚人流,即“平台传播”,是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选择。但是,两者也是基于信息传递,围绕“5W”模式而展开,是传统“内容为王”“渠道为王”工作路径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延续。

2. 现有工作路径较难消解圈子障碍。在新媒介环境下,网络传播“圈子化”导致“构成社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的渠道,已经不是传统的物理渠道,而是人际关系渠道”,^[11]“没有关系的桥梁,内容很难充分的传播与流动”。^[12]缺乏关系互联的支撑,线上圈子的信息过滤机制形成的把关作用能让平台的物理渠道断在通往圈中人的“最后一公里”处,使内容流动停滞不前;线上圈子也会以“群体极化”的文化认识框架,让圈中人接触到但拒绝接受圈外流入的某一文化内容。

因此,仅靠“内容传播”与“平台传播”较难破除圈子障碍,无法有效应对网络传播“圈子化”的负效应。

二、新媒介环境下应对挑战凝聚文化共识的新路径: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

面对互联网在凝聚文化共识中的“最大变量”——网络传播“圈子化”负效应,需要从互联网对“人的关系”的“互联”入手,以网络传播的“关系传播”为基础,积极推动统战工作中形成的关系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这是新媒介环境下凝聚文化共识可选择的工作新路径。

(一)“关系传播”:破除圈子障碍的基础

当互联网进化到 Web2.0 阶段,其对人的互联使得网络传播演化出“关系传播”属性。“关系传播”是网络传播与传统大众传播最主要的区别,也是在新媒介环境下破除圈子障碍,更好地凝聚文化共识的基础。

1.“关系传播”:关系主导传播—传播影响关系。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与大众传播的信息传递属性不同,人际传播具有“关系传播”属性。它体现为关系主导传播、传播影响关系,反映出“传播的本质是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9]人际传播总是镶嵌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及关系网中,受着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人际关系),相当程度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10]并且“关系会影响讯息的传递方式和对意义的理解”^[11]。在人际传播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认同什么通常是围绕关系而确立;或者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及关系网,就会有怎么样的人际传播,而内容却时常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人际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活动,很多时候是出于社会交往的需求,以传播为载体而实现社会交往目的。可以说,“关系传播”是“关系→传播→关系→传播……”的循环过程。

2.网络传播在 Web2.0 阶段演化出“关系传播”属性。互联网在 Web2.0 时代是“个体连接形成‘关系网络’”的形态,^[12]它把终端、内容和人互联为一体。其中,人是各种线上连接的居间者,把“终端网络”“内容网络”嵌套在“关系网络”之中。“关系网络”成为线上平台连接、内容连接,以及线上线下内容流动的“基础设施”。就社会层面而言,互联网的“互联”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网进行“互联网+”的过程。在上述情境下,人的关系正在成为生产、传递、接触、选择乃至理解、认同内容的重要因素。网络传播由此日趋人际关系化。同时,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社交。网络传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交往行为,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互联网对人的互联最终促使网络传播演

化出类似于传统媒介环境下人际传播的“关系传播”属性。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圈子因社会交往而生,“任何一个圈子都是以特定个体为中心的一个人际网络”。^[13]线上圈内“群体极化”、圈间传播共振均伴随着“关系传播”。

可见,统战工作解决圈子障碍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构建关系的“管道”,通过“关系→传播→关系→传播……”的循环,推动主流文化的线上圈内融入和圈间扩散,促进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沟通对话,进而在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中画出文化共识的最大同心圆。

(二)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凝聚文化共识新的路径选择

统战工作的联谊交友客观上形成了丰富的人际关系资源。依循互联网的“互联”规律,充分开发利用此类资源,进行“关系传播”转化,即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是新媒介环境下统战工作凝聚文化共识新的路径选择。

1.统战工作关系资源的“关系传播”转化:构建统战关系传播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14]这充分说明了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就社会交往层面而言,联谊交友伴随着人际关系的构建。统战工作对象主要是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涵盖了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民族、各界人士等不同群体。在与之广交深交朋友的过程中,统战工作通过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等方式,不断巩固、扩大与我党同心同德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客观上形成了与统战工作对象之间丰富的人际关系。其中,在长期联谊交友中与传统统战工作对象已经建立的稳固的相互信任、协力合作、互为支持、患难与共的强连接人际关系,形成了统战工作量大、面广、质高的关系资源。而与新的统战工作对象的联谊交友将会不断扩充既有的关系资源。丰富的人际关系资源也是统战工作相比于其他领域工作所具有的一种优势。对这些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推动其

“关系传播”的转化,有助于在新媒介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凝聚文化共识。

统战工作关系资源的“关系传播”转化,首先要利用统战工作者与统战工作对象、统战工作对象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资源,形成广泛连接的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网。同时,要基于互联网对人的互联,发挥人际关系网的线上传播效用。再者,网络传播离不开“平台网络”“内容网络”“关系网络”三者的互联,“关系传播”因此需融合“平台传播”与“内容传播”。上述过程即是统战关系传播网的构建过程。

2.统战关系传播网的界定。依据前文所述,可以给“统战关系传播网”做一个开放性的界定——统战关系传播网,是基于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资源,依循互联网“互联”规律,以关系融合平台与内容,并连通线上与线下的传播网。它是由线下人际关系、线上信息传播、“平台—关系—内容”三个层面互联融合而成的立体复合的关系传播网。统战关系传播网的作用在于,嵌入、连接网络空间自发生、自主生长的流动性圈子,让主流文化能够在网络空间甚至现实空间广范围扩散、深层次融入,促进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圈内/圈间沟通对话,不断提升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并以此缓解异质圈子的分化、分裂,抑制负向内容的圈间共振,进而在文化多元的新媒介环境中,更好凝聚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文化共识。

具体而言,对统战关系传播网的理解,还需从“关系传播”的过程、互联网的“互联”、线上线下的统一、统战工作在全党互联网工作中的优势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关系传播”包含了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关系主导传播、传播影响关系。在 Web2.0 阶段,传播关系不仅是围绕传播所形成的信息传递层面的生产—消费关系,更是围绕传播而构建的社会交往层面的人际互动关系。统战关系传播网一方面依托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推动主流文化在线上以及线上——线下扩散,另一方面借助网络传播重构统战工作者——统战工作对象——统一战线成员的“互联”关系,再以新的关系进一

步推动传播。这是“关系→传播→关系→传播……”的循环过程。

线上与线下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独立空间,而是实时互动于统一的社会空间。统战关系传播网通过人的互联,以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贯通线上与线下,可实现主流文化在整个社会空间的扩散。

全党的互联网工作在直接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层面,涉及宣传、统战、文化等领域。其中,“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15]宣传工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16]文化工作也需要“大家共同来做”。在“大宣传—大统战—大文化”的格局中,以统战关系传播网凝聚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文化共识乃至政治共识,也是以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及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这可以凸显统战工作在“大家共同来做”中的优势和特点。

(三)统战关系传播网的理想结构

统战关系传播网涉及线下人际关系、线上信息传播、“平台—关系—内容”三个层面,需要以此探讨其理想结构。

1.线下人际关系层面的理想结构。统战关系传播网首先体现在基于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资源的社会网层面,即由统战工作者和统战工作对象,以及统战工作对象之间的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由于统战工作的分层级、分地域、分对象的现实,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分散在不同的统战工作群体中,体现为一个个大小不一、类别各异且相对区隔的社会“小网”。但是,互联网的逻辑“并不是分散,而是网络联结”,^[17]这就需要一张整体性人际关系“大网”应对线上的“联结”。

2.线上信息传播层面的理想结构。统战关系传播网的功能主要在于线上信息传播层面,因而它又体现在由传播节点及其连接构成的线上信息传播网层面。通常而言,传播节点按功能可分为核心节点、桥节点和普通节点。核心节点是具有较强内容原创及加工能力的个体,能够广泛吸引注意力。

他们在圈中处于传播中心地位,可以影响圈内成员对信息“怎么看”。桥节点是同时存在于若干个圈子中并在不同圈子间积极“搬运”信息的个体。他们起到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作用,可以助推信息穿越更大的社会距离,传递到更多圈子的人群中,往往能够影响不同圈子成员“看到什么”。核心节点与桥节点之外的个体便是普通节点。上述三种节点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就推进主流文化圈内融入、圈间扩散而言,统战关系传播网中的传播节点由核心节点、桥节点构成,网中不包括普通节点。

由于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统战关系传播网的线下人际关系层面和线上信息传播层面呈现出套叠结构。但需注意,线上与线下在套叠结构的微观层次并非完全对应。任意两个个体之间,可以同时存在相应的线上和线下连接,也可能仅有线上或线下一种连接。线下的局部强弱关系也不必然反映在线上,反之亦然。并且,线下人际关系中的个体只有充分发挥线上传播作用,才能成为传播节点。这就需要在宏观层次尽可能推动线下人际关系网向线上信息传播网的整体性转化。

此外,对于由技术因素导致区隔的微信等相对封闭的圈子,统战关系传播网较难在线上大范围直接连接。这需要在套叠结构中,通过线下人际关系进行间接连接。

3.平台—关系—内容层面的理想结构。互联网平台是关系和内容的物质载体。统战关系传播网对圈子的嵌入、连接需要通过平台的嵌入、连接来承载。内容便是在这样的网络中流动。因此,统战关系传播网还体现在平台、关系、内容的“互联网”层面。

统战关系传播网的上述三个层面在结构上并非静态分离,而是交融交织为一体。其中,线下人际关系网层面,关乎统战关系传播网结构的完整性和传播内容的主流性;线上信息传播网层面,事关统战关系传播网对线上圈子的嵌入、连接,影响主流文化的线上扩散效率;“平台—关系—内容”网层面,是“互联网+”的体现,决定统战关系传播

网在凝聚文化共识中的最终效用。其中,线下与线上两个层面的套叠结构,使统战关系传播网不仅能互联线上圈子/平台,也可打通线上与线下。

三、统战关系传播网的构建策略

依前文所述,统战关系传播网是线下人际关系网、线上信息传播网、“平台—关系—内容”网的统一体。因此,统战关系传播网的构建,是这三个层面同步构建、互联融合的过程。

(一)构建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整体性“大网”

在巩固发展现有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围绕主流文化传播,创造更多的跨类别、跨地区、跨层级的弱关系连接,把区隔在条块分割的社会空间中的各个统战工作人际关系“小网”连接成一张整体性“大网”,使统战关系传播网以线下人际关系网的整体性而能够在流动的网络空间维持结构上的相对完整。同时,不断在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大网”中增进文化共识,为统战关系传播网的主流文化传播打牢现实基础。

(二)推动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网向线上信息传播网转化

在构建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大网”的同时,基于数量和异质性两个因素,从中广泛选取传播节点的后备者,为扩大网的覆盖面和对多样化圈子的连接提供节点资源。综合考虑政治性、主流文化内容生产能力和信息传播能力三方面因素,在后备者中培育线上传播的核心节点和桥节点。以信息沟通和舆论互动建立各节点间的线上连接。推进统战工作线下人际关系网中的连接向线上延伸,并建立新的线上连接,在“关系→传播→关系→传播……”的循环中,形成稳固的强弱关系纵横交错的信息传播网。并同步推动信息传播网对线上圈子的嵌入和连接。

(三)加快平台—关系—内容互联融合

统战关系传播网的构建离不开统战互联网平台及其内容建设。在加快线下人际关系和线上信息传播两个层面“织网”的同时,要以“微平台”为重点加强统战平台及其内容建设,并通过平台、内

容与关系的互联融合构建“平台—关系—内容”层面的“互联网”，以此充分发挥统战关系传播网在凝聚文化共识中的最大效用。

首先，完善平台集群。在继续做好统战官方 PC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同时，重点加强统战官方微博和头条号等主流“微平台”建设；加快统战个人“微平台”建设；积极打造一批文化类统战平台。形成以党委统战部官方平台为核心的纵横交错的平台集群。

其次，增强内容引导力和吸引力。一方面，做到“四个讲清楚”，不断增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精神力量；并要综合考虑主流文化传播的“时度效”。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内容生产做到“三贴近”，真正满足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注重共性需求与个性需求的统一；要善于“讲故事”，侧重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符合网络传播特征及平台特性。

最后，推动平台、关系、内容的互联融合。让统战关系传播网中各个传播节点嵌入、连接各类平台/圈子，开展关系互动，传播主流文化内容，实现平台、关系、内容的互联融合。这在微观层次体现为三个同步交织的过程：通过关系为统战平台/圈子引入人流，以内容的吸引力和关系互动，争取统一战线成员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利用关系把主流文化引入其他平台/圈子，通过关系互动加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沟通，扩大文化共识；以关系的线上线下连接，实现主流文化线上线下的同频共振。

需强调的是，统战关系传播网实为一张党内外、体制内外和海内外关系互联的传播网。本文基于大陆范围所探讨的统战关系传播网因而存在向大陆范围外的统一战线延伸覆盖的必要性。这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 (2015-12-16)(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117481089.htm).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 [美]凯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M].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
- [4] [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 [5] [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89.
- [6]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86.
- [7] 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5.
- [8] 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3(12).
- [9] 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J].现代传播,2006(3).
- [10] 陈力丹.试论人际关系与人际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5(3).
- [11] 王怡红.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 [12] 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3(12).
- [13] 朱天,张诚.框架理论视域下互联网圈子的传播结构认知[J].现代传播 2015[10].
-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95.
- [15] 新华网.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EB/OL]. (2015-05-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 [16] 新华网.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EB/OL]. (2013-08-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3.htm.
- [17] [美]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对话卡斯特[M].徐培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7.

编辑:王芳

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价值功能探析

常 婧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协商民主进一步定位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再次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高度为协商民主提供价值合法性根据,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论断,必须深刻认识并充分运用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双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民主形式,运用协商民主解决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时代的中国道路,需要系统认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和时代意义,需要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一种治理方式和一种转型机制的角度来加深协商民主在治国理政全过程中的理论定位,进一步增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政治性、科学性、有效性,运用协商民主工作机制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效能。

关键词:新时代;协商民主;价值功能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63(2018)01-00025-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民主的研究和实践也应当具有新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工具合法性之外,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还具有深刻的价值合法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与人民商量办事,是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所在。因此,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将协商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2]这两处高屋建瓴的概括,从民主本质、实现方式、党的建设三个方面将协商民主的价值合法性进行了

科学论述,必须深入研究并充分认识这全新的理论成果。而协商民主的研究者和操作者也正在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理论与实践的碰撞恰逢其时。深刻认识并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需要将协商民主还原为一种民主形式、一种治理方式、一种转型机制,全方位考察协商民主的结构功能和时代意义。

一、民主形式:主动的话语回应和制度选择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两种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定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环节,是为

收稿日期:2017-11-25

作者简介:常婧,国家卫生计生委党校讲师,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协商民主、基层党建。

人类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创举。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是规律性与适应性的有机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有力回应。

(一)民主没有普世标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民主形式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应该存在民主形式的普适标准和价值判断。西方票决民主长时间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但在经历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风波之后,西方民主的兴盛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引起热议,西方民主的基因缺陷再次显露出来。西方民主制度运行中的三个前提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2]从根本上被动摇。西方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特别是精英、中产、草根之间的严重分野,使得票决民主不可避免地受民粹主义所裹挟,选民持有的不再是理性选择的慎重一票,而可能是带着无知、傲慢与偏见的一票。这样,被奉为像宗教一样不可侵犯的大众民主一次次出现了低质量、非理性的结果。另外,长期以来追逐个人绝对权利,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存在难以弥合的差异,加剧社会的分裂和离散。加之,人们过度关注程序是否正义,好像这个程序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当人为设计的选举程序选出了令人不满意的结果时,人们才意识到似乎这样单向度的民主似乎缺了点什么。票决民主的多数决逻辑能够解决程序正义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实质正义和公义的问题。政党和候选人对程序正义的无限追求,使得这个体制花了很多精力去经营形象、口才、支持率,很难产生深具韬略的政治家。因此可以看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唯一出路,也经历着风险和考验,西方民主不应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体制给予价值批判和偏见,不应持有“不搞西方民主就等于没有民主”的二元对立的態度。

(二)协商民主是中国主动的制度选择。中国

共产党将协商民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位置,成为中国道路的立身之本。我们的民主不是西方式民主,而是源于政治传统和革命实践的“中国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特创造和伟大实践。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问题的探索从“不拘一格”的民主形式,发展到“自成一格”的民主形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尝试,发展到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的制度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这是一个从被动破坏到主动建构的过程。中国拥有庞大的传统文明体系和历史传承,纵使朝代更替,依然具有强有力的政治稳定性和文明持续性。深处其中的文化惯性,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和破坏,很难拥有与旧体制主动诀别的勇气。旧世界打破以后,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而且是逐步探索中理性地建构了一套相互适应的新制度体系。中国政治主动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改革开放,选择了人民民主。每一步的主动选择,都是基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选择了协商民主制度,是牢固建立在人民民主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制度建构,意味着中国在民主道路的选择上走出了坚定一步,是对世界民主话语的有力贡献。党的十九大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道路的价值合法性,中国民主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3]

二、治理方式:有效运用协商治理的嵌入机制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根基,是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延续至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时代的变革使得政治协商的结构功能也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将政治协商制度大大向前推进,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深入。政治协商不再只是理论建构和制度安排,更重要是成为活生生的政治实践。“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4]党的十九大特别突出了协商民主的实践性,要求“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5]通过协商治理的方式,将民主的实质回归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上来,这是中国民主问题的创举和出路所在。

(一)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是二者的自然相遇,协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和必要工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中央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和治理难点提出的统领全局的战略构想。尊重多元,平等对话,共商共治,是协商治理的应有之义。社会治理效果评估是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群众的满意度是最明确的也是最难以衡量的指标。嵌入协商要素之后的社会治理,把群众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融入整个过程,落实了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减轻了政府的无限责任,拓宽了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成为缓和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良好平台。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多元、平等、理性等协商精神是社会治理者和参与者的共同追求。

(二)协商治理的研究和运用,具有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必要性。从应然角度看,良治、善治自古

以来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天然责任和理想追求;“郡县治,天下安”也表达了基层社会治理对国家大计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作用。基层的矛盾化解在基层,最好的方法就是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是人民民主最微观的实现。从实然角度看,利益分化是基层社会矛盾的主因,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在处理社会纷争的功能上由来已久。但朴素的协商形式往往是自发的、无序的,始终停留在小打小闹、商量办事的碎片化层面,容易受到权力、势力、金钱的左右,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自然也就效果寥寥。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既避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乱象,又避免了群众诉求无门导致的社会失序,是有效的新兴社会治理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治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被赋予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更能生发出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操作空间。

充分认识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和时代意义,有效运用协商嵌入社会治理,才能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在工作中不错位不越位,有效利用协商民主的程序和方法,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突出矛盾。“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6]可见,中央关注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关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只要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就是协商民主的重点领域。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思路就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满足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解决人民群众的重点关注和矛盾问题,这是当前一个时期基层党政工作的重心。协商民主给予社会长期积累的复杂利益问题一个解决的出口,可以将矛盾冲突及时化解,而非扩大化、严重化。在协商治理的条件下,党和政府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充分联系群众,摆正

位置,调整角色,以科学规范的工作程序构建清新实干的政治生态。

三、转型机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抓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党的领导更加强有力。协商民主无论是作为民主形式的探索和实践,还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利益实现渠道,都需要责任主体的贯彻执行和稳妥推进,这个主体就是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需要直面复杂的新问题,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体现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良性转型态势。如何实现这种良性互动,根本上就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就是要求执政党以协商的姿态和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真正俯下身、沉下心,耐得住性子、放得下架子,务实清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政党与社会的良性沟通,平等对话,互利共赢。

(一)目标方向。执政党通过协商民主治理社会,为达到良善和谐的治理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公信力、凝聚力、影响力,最终目标是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因此,社会治理与党的建设最终指向性是一致的。然而,为实现终极目标,有不同的施政策略,这就是考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否的关键所在。如果用行政命令刚性治理,需要依赖强人政治、超人政治,依赖当政者的良心和能力,必然是高风险失序社会,群众没有主动权,没有话语权。如果用协商民主柔性治理,依赖的是群策群力,激发群众的自治能力,搭建平台协商对话解决问题,自然是低风险可控社会。尊重多元,平等对话,共商共治,是协商治理的应有之义。在这个策略选择上,协商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引入机制,将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是一次生动的政治实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社会革命。

(二)根本动力。在协商治理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才能保障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协商民主建设的根本动力问题。功能决定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就决定了作用发挥的效果如何。传

统治格局下,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一肩挑的角色,责任大、权力大、抱怨大。引入协商机制,就是让执政党转型升级,扮演好社会事务的组织者,把利益相关方组织起来,制定规则,跟踪效果,落实督办。这个组织者的角色发挥得好,协商治理就充满了持续的发展动力。党的作用以退为进,才能更好激发社会多元治理的能力,激发基层群众的自治能力。协商民主制度让公民回归到协商平台上进行平等对话。执政党的转型过程,就是一个引导群众走向自治的过程。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强调,人通过行动在公共领域发现了公共荣耀,而生成了公共精神,这是人之为人的表征。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就是要激活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本能。

(三)平稳安全。无论是政党还是社会,转型的过程要把握好节奏。在政党与社会之间,有一个控制节奏的阀门,那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通过组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来孵化公民的议事协商能力,在政党与公民之间充当缓冲地带。现代治理条件下,社会组织化仍然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重要方法。当然,现在的组织方式有所不同。传统乡土社会的组织化依赖于宗族社群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进行改造后,产生了去组织化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依托利益关系进行再组织化。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再组织化的必经过程,执政党通过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搭建不同利益之间的协商平台,才能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3).
- [3] 张维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三个基因缺陷 [N].光明日报,2014-09-19(11).
-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编辑:龚万达

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难题与对策

——贯彻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条例》的思考

李梅香

摘要: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发,以其鲜明的问题导向回答了统一战线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可资操作的统战工作法规,对统战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结合常州实际,本文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条例》中出现的困惑,分析统战工作存在的四大难题,并立足本地实践提出六点对策与思考。

关键词:统战工作;难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1-00029-07

一、问题困惑

(一)认识困惑

中央对统战工作很重视,但是市级层面的领导对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仍然重视不够,不重视的原因主要是依然存在认识上的困惑,表现在法宝作用发挥有限、统战功能边界模糊、统战资源泛化等方面。

首先是法宝怎么用的困惑。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条例》虽然从根本讲清了统一战线在新形势下为什么仍然是重要的法宝、是什么样的法宝,但是,法宝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管多大用处,仍然没有讲清楚。从党的历史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看,法宝的使用是一个战略和策略问题,法宝不是时时刻刻拿出来用的,总是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口充

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执政兴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要解决的依然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对如何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缺乏更有力的机制保障和具体操作程序,如同侠客舞剑,需要剑客具备对剑术化有形为无形的深刻理解,否则无法心手合一,运用自如。

其次是统战资源泛化、功能边界不清的困惑。《条例》明确了统战工作对象和范围,统战资源可谓丰富,可是任何事物越是包罗万象越加什么都不是,丰富的统战资源对领导干部来说面临泛化的困惑。除了民主党派成员、宗教界人士带着鲜明的统战对象特色,其他的工作对象与其他各部门都有交叉,且统战部门在此方面开展工作时没有

收稿日期:2017-11-25

作者简介:李梅香,常州市委统战部综合处处长。

抓手,缺乏人、财、物的优势,往往是种了其他部门的田,工作成效也一般。比如港澳台海外工作,对台工作有台办、台联,侨务工作有侨办、侨联,港澳工作有港澳办,这些部门有人员编制、有职能定位,统战部门开展这项工作缺人少编无抓手,无具体的指标要求和职能目标,出现了做不做无所谓、做了是抢职能部门的工作、吃力不讨好、做了不如不做等等的困惑。作为统战工作的看家本领——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其实在任何岗位任何部门都需要也都可以交朋友,这是我们党工作方法问题,不独是统战工作。

最后是一致性多样性的理解困惑。统一战线范围广泛,领域众多,包含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民族,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的思想文化、社会价值、行为方式多元、多变。但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共同确立了国家或政府的主导地位,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有多样性就要有吸纳、联合多样性的体制,社会不同利益如何得到有序的集中、传输、协调和组织,并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有效吸收社会需求,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不损害秩序的限度,这是我们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问题上面临的困惑和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二)政策困惑

我国的统一战线不仅上升到国家战略,并且已从政策层面有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规定。纵观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思想,包含着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从政治制度看,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从经济制度看,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颁发,这些政策制度为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在统战工作实践中,随着形势的变化,依然存在着照顾同盟者利益法理基础不够、民主监督程序缺失、相关统战法规不完备等政策困惑,当前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大都与政策不完善、贯彻

执行不到位有关。

一是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法理基础是什么?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人们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市场意识和公平意识不断增强,统战工作的政策优势逐渐消退,法律手段的作用不断显现。现实社会中,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必须逐步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解决。比如,统一战线的一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就是照顾同盟者利益,现阶段,统一战线成员利益需求多样化,价值标准多元化,利益差别日益明显,协调难度不断加大,如果还是依靠党的执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来照顾同盟者利益就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如何把握政策和法律的关系,把照顾同盟者利益落实到依法维护统一战线成员合法权益中来,为他们施展才华创造条件,对统战工作而言是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是民主监督程序无可操作的政策依据。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大众的参与。北宋王安石为强力推行变法,大力清除对政府进行批评的御史台,批评朝政之权受到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破坏,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的部分,北宋的灭亡与此有直接的干系。御史台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其作用就是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和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谏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古代的这种监察机构并不受法律保护,全凭皇帝宽宏纳谏与否。我们传统的统战工作方法一直讲,要虚怀若谷,听得进不同意见,现代社会,广开言路不能完全靠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雅量,还要有法律的保障。《条例》在第三章第 14 条提出了民主监督的十个方面,但是形式再多没有明确的制度和程序保障民主监督依然显得苍白无力。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力求法治,在实践中也采取了相当的具体措施,比如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制定“依法行政”的行动纲要等,我们期待在吸纳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开展民主监督时,也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和保护不惧利害的议政渠道。

三是相关统战法规的不完备、执行不力。统一战线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利益共同体。处理政党、

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这五大关系时,在考虑他们多样性的同时就是要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比如,新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思维活跃,社会法制意识较强,迫切希望社会机制的公平与公正,他们中大部分人掌握社会的财富,功利性也较强,在一些问题上常常从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理念只有落实到法律和制度之中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的政党制度已明确写入宪法,也已经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宗教事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立法的过程十分纠结、困难,有些法律,比如《商会法》迟迟不能出台,有的法律出台了,但执法难,有法不依,执法不到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条例》的颁发确定统一战线的相关法规,并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制度性的发展空间,下一步如何制定《条例》有关规定的实施细则,基层拭目以待,期望法律的保护与制约作用同时推动统战工作更具操作性。

(三)方法问题

统一战线各领域多元发展的态势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具有群体性和系统性,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等范畴,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中,统战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还存在工作抓手不多、参政议政质量不高、联谊交友不够、统战宣传单一等诸多问题。

一是统战工作抓手不多。统战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强,对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的工作方法不是靠行政命令开展,而是加强民主协商,对党外人士主要是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这要与组织部沟通),如何正确把握一致性多样性的方针尚没有具体的方法,由于缺乏抓手,在统战政策的运用上还存在不太懂、不会用、以致政策资源白白浪费的现象。统战系统虽有海外联谊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新阶层人士联谊会,以及各类商会、同乡会等社团组织,但如何发挥社团的作用因社团领导的变化而异。统一战线本该是重要的智库,但是除了统战理论研究会这个传统的研究性组织,开放

性的智库组织还没建起来。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如何通过线上线下做统战工作是统战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课题。

二是推动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效果不显著。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私人物品的短缺转变成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对公共品的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教育医疗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等。社会的主要矛盾日益凸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意见建议,充分尊重多样性、容纳多样性,鼓励并保障各界人士以各种渠道表达不同的声音。这不同的声音或许正是执政党孜孜以求要去改革创新的地方,即便是错误的声音,也要正视这多样性的表达背后传递的社会信息。在今天的多党合作中,不是同太少,而是异太少,党外人士在政治协商时避实就虚,不能推心置腹谈真实的想法,甚至出现异口同声或哑口无声的极不正常现象。参政议政如何提高质量,不是单靠党外人士一方完成的,需要中共的推动,需要给党外人士机会,需要真切回应党外人士的诉求,需要提供良好的环境让他们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参政议政的大花园里盛开芬芳之花。

三是联谊交友不够。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党政领导要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常州虽然制定了市委常委联系党外人士的制度,但是交友的广度深度上还有待提高,尤其是交新朋友,如何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党外人士建立友谊、持续深交,明显不如老一辈的党政领导。尤其是如何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通过新媒体建立党政部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经常性联系机制尚需深入研究。

(四)机制问题

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配强了统战部,市委常委兼任统战部部长,但是统战工作机制仍然有待完善。

一是队伍建设不强,大统战格局尚未形成。涉统战工作部门众多,各部门间职责交叉,有些部门职

能雷同,工作对象一致,既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工作,也存在同一对象你也联系我也联系的现象,各自为政、各走各路,整体工作合力难以形成。一些辖市区的民族宗教、对台、侨务、工商联等“涉统”部门,有的单列,有的和统战部或其他部门合署办公,出现了“统一战线不统一”“小而全、小而散、小而弱”的现象。基层统战部牵头协调作用受到限制,难以有效履行党委主管统战工作职能部门的职责,难以整合分散的力量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市辖区统战部门长期以来编制少、人员少、经费少,内设机构不完整,办事人员明显不足。全市乡镇(街道)虽已全部配备了统战委员,但大部分是兼职而非专职,有时对统战工作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开展。统战机关干部中还存在着交流与轮岗机会少、提拔上升空间小的现象。

二是高校统战工作尚未形成完善的常态化的统战工作机制。当前,高校虽然都设有党委统战工作部门,但多数与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或机关党的工作机构合署办公,一般情况下,在合署办公的机构中也只是由一名工作人员兼职做统战工作,在工作对象上,高校普遍把民主党派工作放在首位,其他如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侨务工作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的工作等没有很好地顾及,特别是宗教工作,多数高校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尽量不触及,对高校聘请的外籍人员、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往往采取单独管理的方式,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问题鲜有过问。没有面向更多的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海外归来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及时组建适合他们特点和要求的交流、管理、交流、发挥作用的平台。统战工作的优势尚未发挥,民主党派组织和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三是企业统战工作缺位,统战工作无法开展。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企业党政领导对统战概念不清晰,统战组织不健全,基本没有设专门管理统战工作的机构,企业内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或者其他统战组织缺乏,党派成员的活动减少,民主党派成员数量

也在不断下降,党外人士参政议政难。

二、实践难题

(一)重要性落地难。统战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在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会感受到执政的危机感。一方面,基层组织的行政权力也并不是来自于上述竞争。这样在考虑问题和决策时,会更注重上级的意图和自主的意志。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拥有强大的行政推动力,基层党政主官不会把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形成统一战线作为主要工作,也难以形成量化考核,或者说需要研究怎么量化和考核。

(二)工作乏力执行难。首先,工作难以使力。统战工作对象面广量大,很多对象是在体制外的人员,缺乏相应的权责和人财物的投入,也缺乏有力的抓手和有效的机制,因为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方法联谊交友主要还是依靠各种各样的联谊会等社团组织。其次,工作交叉重叠。统战工作很多的对象和事务与其他职能部门交叉,边界不清,即使是牵头抓总也需要明确的授权。

(三)一致性和多样性衔接难。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分层越来越细化,人们的思想认识、生产活动、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并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和网络,互联网更是提供了虚拟平台。这种背景下,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致性),如何与多样性的社会基础对接,正在考验我们的执政能力。一方面,一致性如何包容、吸纳多样性,这需要更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多样性如何求同存异、同心同向,进而趋向一致性,既有利益诉求不同的问题,也有思想认知不同的问题。政策决策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同盟者的利益,并通过法律去规范。

(四)准确把握政策难。统战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关系到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一国两制”、和平

统一的大政方针。这些基本制度的设计,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式智慧,在实际操作中,争取把握和执行的要求很高,需要原则、政策,需要方法和技巧,需要底线和尺度。

三、对策思考

(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增强统战意识。当前统战工作最大的形势是面临复杂的多样性,不仅有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社会阶层的多样性,还有利益和思想观念的多样性,诸多的多样性使思想共识的凝聚面临严峻挑战。第一,要丰富发展“求同存异”的统战工作原则,在正确对待多样性的同时,还要善于把多样性的利益表达统一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第二,要在法治进程中推动相关一致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发展中促进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序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类协商会大多不是法定会议,以非正式会议居多,会议协商功能总体而言能力不强,会议中协商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过程并不取决于意见表达者。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协商民主的推进和完善的问题。统一战线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先行区,可以探索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增进有效的、合法的一致性。第三,要不断增强党政部门领导的统战意识。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但是,许多党政干部不了解统战,不重视统战,不会运用统战工作方法,认为统战工作就是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的作用,加大对党政干部统战理论政策的教育培训。党的干部统战意识和统战工作的领导能力加强了,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上就会更加敏锐、理性、科学。

(二)把握统战工作重点难点,健全机制完善政策。增强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改进和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作用,在面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问题

上增进共识,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统战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要积极策应这些重点难点问题,必须把握形势,破解体制机制上的难题,健全相关工作机制。要以《条例》和《实施办法》中的原则要求为准绳,真正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格局。第一,要在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和相关干部管理等方面,健全统战部牵头协调的工作机制,成立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条例》要求,落实党委统战部长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或兼任的规定。第二,要破除思想上不重视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可有可无的认识误区,完善思想政治引导机制,落实“把统战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和党委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考核内容”的要求,充分发挥教育引导作用,把统战理论政策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内容,加强全民的统战思维教育。第三,要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巩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统战和民宗部门综合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民宗工作格局。第四,要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状况分析研判机制,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工商联党组的作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支持、统战部组织协调、工商联具体实施、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的非公有制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第五,要建立健全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发挥海外联谊会的作用,形成统战部牵头,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部门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共同参与的海外统战工作格局。第六,要统筹协调力量,建立健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代表人士、留学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统战工作机制,横向建立三类人员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纵向建立三类人员的联络联谊组织,积极组织开展活动,举办专题会议和培训班,听取意见建议,加强教育引导,真正把有担当、敢作为的代表人士团结起来,作用发挥出来。

(三)支持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彰显制度效能。要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性,多想一些办法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发挥出来,以更好地体现这项制度的优势和效能。第一,要真心实意支持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协商尤其是政党协商,在一定范围内向民主党派负责同志通报重要文件,细化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内容、程序等具体规定,制定协商计划,定期举行重大问题通报会、报告会,回应具体问题,让他们知情参政,参政参到实处。第二,要重视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尊重他们的民主党派身份,不要畏首畏尾,积极落实相关文件精神,为他们在主流媒体发声创造平台。要重视民主党派开展对外交往、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就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开展考察调研,支持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支持他们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第三,要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解决民主党派履职尽责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落实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入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的要求,协调解决加强民主党派机关建设、提升民主党派干部队伍素质等具体问题。无党派人士是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无党派人士身份更超脱,是民主党派重要人才的“蓄水池”,要加强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在机制、载体的建立和完善上不断发挥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

(四)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进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是统战事业的活水源头,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是关系统战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第一,要在做好现有党外代表人士的基础上,加大发现、培养、使用专业界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力度。要与新社会阶层、留学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重点人士多打交道,通过主动接触、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成为挚友等步骤,物色一批新的党外代表人士,善于发现他们

中有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身份等综合特质的人士,使现有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从知识结构、界别特色、年龄结构等方面更趋多样化、合理化。第二,要积极推进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进一步落实党外人士在市及市辖区两级人大、政协中占有的比例和数量,以及政府必配部门配齐党外领导干部的要求。适当增加无党派知识分子、新生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的比例。第三,要研究解决党外代表人士选拔使用的规范性程序和举措,建立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作用的综合评价体系,做到凡进必评,真正把那些思想政治强、行业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党外代表人士发掘出来,使用到位,发挥作用。第四,要强化对民主党派、无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有制经济、港澳台海外等党外代表人士组织和队伍的管理和监督,并发挥好党外代表人士所在党派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作用,同时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题培训班、研讨会、论坛等,对党外代表人士精心培育、细心浇灌、用心呵护,以达润物无声之效果。

(五)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破解具体难题。基层统战工作力量薄弱,“统一战线不统一”等问题和困难影响了统一战线优势和作用在基层的发挥,要加强对基层统战工作的指导和支持,积极为基层开展统战工作创造条件,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基层统战工作长远发展的具体难点问题,夯实统战工作的基础。第一,要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力量,确保有人管事,有力量办事。充分保障市辖区统战部门和民族、宗教、工商联工作机构和人员、编制、经费,镇(街道、开发区)党委要明确分管领导,配备统战委员,并配备专职统战干事或工作人员,统战委员任免前要征求县(市、区)委统战部的意见。要制定完善社区统战工作制度,在社区培育和发展商会、新阶层人士联谊会、少数民族联谊会等统一战线组织,探索社区统战工作新机制。第二,要加强重点园区、高校、科研院所、大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关人民团体和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统战工作机构和职能建设。统一战线工作

任务重的应设置统一战线工作机构,配备专职统战干部,与党委其他部门合署办公的要定职能,明确专人负责统战工作,全面反映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及时化解苗头性问题。第三,要把做好民族、宗教的工作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主要内容,抓紧抓扎实。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大多工作、生活在基层,要善于做这一部分特殊群众的工作,及时掌握情况,帮助落实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已超过县域经济总量的90%以上,要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加强工商联基层组织建设,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丰富发展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统战部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士、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的职责,这对加强统战部门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一,要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精通统一战线历史,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全面提升能力素质。要对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切实解决统战工作中不严不实的问题,真正赢得党外人士的尊重和认同,使统战干部成为党外

人士之友、统战部门成为党外人士之家。第二,提高统战部门的社会管理水平。统战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但是统战工作又最富人情味、最讲艺术性,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战部门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依法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统一战线成员的合法权益。第三,拓宽统战干部的视野,加强调查研究。统战干部做的都是统一战线代表人士的工作,要技高一等、艺高一筹,加大知识储备,尤其要涵养人格魅力,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要有民主的思想和法治的理念。统一战线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统战干部要加强调研,了解情况,总结规律,讲究方法,深入研判社会形势,协调统一战线中方方面面的关系,解决制约统一战线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第四,要丰富发展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研究开展新的社会群体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善于利用新媒体开展联谊交友,不断挖掘新渠道培育新载体,稳妥开展网络统战工作,耐心细致地寻求最大公约数。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开展统战宣传,利用有效的宣传掌握话语权,为做好统战工作提供舆论支持。

编辑:鲍跃华

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创新研究

曾土花

摘要:当前大数据作为信息资本和数据资源将对党外人士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培训过程和培训实效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现阶段我国各社会主义学院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教育培训起步相对较晚,面临教学资源缺乏共享化和精细化、培训过程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过程缺乏灵活性和互动性、培训效果综合评估重管理缺乏反馈的困境。因此,有效运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健全教育基地信息化建设制度、完善培训信息管理制度、完善教学形式多样化机制、健全沟通渠道多元化制度,对于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数据;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63(2018)01-00036-05

党外代表人士作为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教育培训机制的创新,直接关系到队伍建设的实效性和有效性。特别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移动终端等迅速发展,大数据也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引发党外干部教育培训的全面变革。因此,大数据时代下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创新的意义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党外人士素质能力的重要途径,是统一战线经常性、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当前,大数据作为信息资本和数据资源将对党外人士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培训过

程和培训实效产生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

大数据为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工作带来新的转变,是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大数据为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个性化发展、在线学习效果和质量评估效果的改进与提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好教育培训的体制机制,适应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规律和特点,建设课堂教、实践锻炼、网络培训平台等优势互补、布局合理的教育培训阵地。^①《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党外代表人士的特点,创新培训方式,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探索互

收稿日期:2017-11-20

作者简介:曾土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史党建专业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2017年度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课题成果。

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进一步增强理论培训实效。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根据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规律,以及党外代表人士来源广泛、分布各个领域的特点,利用大数据因地制宜的设计个性的培训方案,运用互联网便捷式的线上培训方式,搭建网络培训平台。

(二)推动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主阵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云计算现代化信息技术资源的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主阵地的跨越式发展。一是互联网能够整合全国社会主义学院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通过社会主义师资库的建立,组建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弥补各地市社院师资严重不足的缺点。利用大数据下的海量师资库资源,为不同省份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提供针对性的教育。二是搭建社会主义网络学院学习平台。“中国干部网络学院”通过网络平台为领导干部提供海量的学习资源,如课件库、文献资料库、案例库。还和高校联合起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同研制精品教学资源。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培训工作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功能分析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需求,搭建网络化的平台满足党外代表人士培训需求,设计菜单式的网络课程,丰富的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之间的深度融合。

(三)适应新时期网络统战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据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新增网民2132万人,与2015年底相比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4]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逐渐扩大,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50%。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平台畅通了党外代表人士与群众联系的渠道,党外人士线上培训和线上交流也逐渐发展。《2014—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深度分析及产业链投资潜力研究咨询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在线教育的发

展进程日益加快,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也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5]如通过视频播放、线上上课、线上互动、线上评价的方式,增强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意识,凝聚共识,提升辨别信息真伪、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提升参与网络统战的能力。

二、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特点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提升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党外代表人士的内涵。党外代表人士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作出较大贡献、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非中共人士。^[6]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启了教育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基于信息化技术的伟大变革,使我国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教学模式被逐渐改变。大数据时代,教育不仅具有前期网络教育所具有的网络化、多媒体化、跨时空等特点外,还具有在线化、个性化、移动化、智能化、社会化、数据化等特点,教育内容更新快速,教育方式灵活多样,诸如翻转课堂、手机课堂、慕课、微课、弹幕教学、轻应用平台等都是大数据教育的创新结果。培训对象由“数字移民”变为“数字原住民”、教学资源由纸质资源变为在线资源等。^[5]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也面临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教学资源、教学方式和教学环境都有新变化,这些变化给传统的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机制带来新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与传统的党外代表人士的教学环境具有固定性和教学时间固定,并且主要是在课堂的教育不同,随着互联网和网络终端设施的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可以在网络环境下随时随地自主性接入学习。由于大数据时代网络教育的便捷性与云计算功能的发达,使得培训能够做到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个人需求相统一。教学形式丰富多样,教学方法灵活,能够为党外代表人士定制个性化的教育培训方案,学员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搜集相关素材,并随时切入和转换学习的界面。师生互动方式多样,

实时在线讨论、学习交流等。同时网络平台具有共享性,可以共享学习内容、学习笔记等等。与传统的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相比,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特点具体如下表。

传统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特点	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特点
教学时间、地点固定,主要在课堂	各种终端和网络的环境下随时随地的自主性接入学习
教学主要满足组织需求与岗位需求,兼顾个人需求	组织需求、岗位需求、个人需求相统一
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学内容具有统一性、通用性	满足个性化需求,内容完整、结构化,表现形式丰富
学习内容程式化,严格按教学方案执行教学	学员按需学习,可以多平台多界面搜寻学习资料,并随时切入和跳出学习界面
师生间、学员间在课堂进行互动、交流	实时在线讨论、辩论 PK、学习方法的交流等
课程设计模块化	利用互联网整合碎片化的学习内容
独立学习,单独记笔记、查资料	共享学习内容、学习笔记,或多人协同完成笔记或资料
教学管理琐碎、复杂	教学管理在线化、精细化、科学化,实现教学管理及时、高效
人工录入并统计学员信息、需求信息、调查问卷等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的方式统计分析学员信息、培训信息等
培训结业后出教学测评结果	随时测评教学质量与效果,实时反馈学员意见

三、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和互联网发展的不断深入,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呈现新的特征,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主阵地社会主义学院也在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完善信息化建设。但是在实践中,大数据时代下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困境。

(一)教学资源缺乏共享化和精细化

教育资源是教育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到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教学资源缺乏共享和精细化,体现在:一是受制于教育支持系统的限制,使得一些教学资源缺乏共享化。目前,网络教育平台对学习资源格式、规范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中国干部网络学院”曾对精品课程资源标准给出指导性意见,并对文件格式、数量、大小等提出具体要求。此外,各平台学习课程制作标准、制作框架、播放工具的不统一,造成了资源难以在平台间形成共享。尽管各地网络学院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不能做到与其他在线教育学院无缝对接,共享教育资源,网络教育也呈现单打独斗的特征。二是教育资源缺乏精细化。目前,一些教育资源的应用平台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对平台应用的评价更多的是停留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应用层面,而对于教育资源的评价偏少。这给党外代表人士获取精品教育资源增加了难度,使得党外代表人士在繁多的教育资源中难以发现满足需求的针对性精品资源。

(二)培训过程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由于受制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育培训过程的培训机制尚未能与大数据的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使得教育培训过程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教育培训的模式呈现比较老套和固化的特点。即一般采取教育培训的方式是年初制定教育培训计划,主要是根据以往的办学经验安排教学计划,尚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分析以往教育培训方案的优缺点,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定制培训方案,而不是纯粹根据当前的需要对以往的培训方案做调整。二是在培训前期,缺乏对党外代表人士情况的分析和调研。只是录用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的个人信息和相关的基本信息,没有将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信息加以分析。没有充分分析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需求、岗位需求,并比对以往的培训记录。这样容易忽略党外代表人士自身的成长规律和培训需求,使得在具体培训的过程

中,出现培训内容重复、培训方式方法不适用于党外代表人士自身的情况,培训目标的不符合党外代表人士成长需求。党外代表人士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将所学知识和所学技能拓展到相关的领域,进而挖掘出更多能够为党外代表人士提案的有效意见建议。

(三)培训过程缺乏灵活性和互动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普及,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的教学方式方法有了一些改革,如成本较低、操作容易、安全性高的依附于政府网站的网络课堂;成本较高、独立性强的社会主义学院官网的学习网站,通过注册网站学员可以共享网站资源;一些公开性的网络学习网站,如宣讲家网。但是这些网站的设计还停留在快捷、零碎地讲授知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较少。一些公开的网络课堂也主要是将教师的讲授课堂录成专题,辅之以PPT,简言之,就是把传统的讲授式课堂搬到网上。网络互动和网络沟通的多元化平台尚未搭建起来,不能为学员的即时沟通提供技术性的支持,沟通的平台还停留在热线电话、网页、邮箱、论坛和博客空间等传统网络平台,而当下比较流行的QQ、微信、微博平台尚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展。虽然网络教育弥补了传统教育时间地点教育的局限性,但是网络教育也主要以电脑、投影大型设备为主,便于携带的手机网课堂仍然比较少。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网络教育的灵活性。

(四)培训效果综合评估重管理缺乏反馈

目前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需求调研还停留在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研的方式获得一手数据,然后通过录入数据库,通过数据处理软件如SPSS对相关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对掌握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情况有一定的作用。但这毕竟是比较狭小的数据,很难对党外代表人士这个群体的培训情况做出准确的统计。对党外代表人士培训信息的统计和分析,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数据管理阶段,没有对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情况提供及时反馈信息,更没有通过数据分析对党外代表人士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目前,大多数干部网络教育

平台对学习过程仅提供“时间进度条”记录功能,这种粗放式的监管已严重抵消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⑨不能够准确地收集到学习点的反馈信息。

四、大数据时代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创新对策

201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将大数据与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深入融合,创新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以期提高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健全教育基地信息化建设制度,打造共享精品资源

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高度重视信息化的建设,有利于推动教学精品资源共享。一是建立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的网络教育资源机制。各省社院也应联合基层社院建立和完善各省的社院师资资源库,随着全国及各省社院师资资源库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通过网上社院的不断完善,使得教学资源可以实现在全国社院之间的相互共享,甚至可以实现不同地方的社院之间同步教学。二是完善资源更新与资源进化相结合机制。党外代表人士网络学习资源建设要及时更新课程资源。除了新的课程资源之外,原有课程的精华部分、精品部分也是学员学习和关注的重点,因此需要对这部分资源进行进化再生研究。根据学员的关注热点、学员工作领域、学员兴趣等进行平台资源推送制度,以期帮助学员减轻获得精品教学资源的难度。

(二)完善培训信息管理制度,提升智能化水平

科学合理的培训信息管理制度是有效进行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重要环节。一是完善培训信息收集制度。党外代表人士培训信息制度,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信息采集技术,建立每个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档案。采取外网和网络社区的方式进行管理。如充分利用网络社会主义学院的网站功能,允许党外代表人士自行申请账号,注册填

写基本信息,生成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有效的管理。二是建立培训需求分析机制。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分析海量的培训数据,利用分析结果针对性配置参训者,有的放矢地调整培训规划布局。在培训前,可以通过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需求做一个量化的分析,将党外代表人士的“学员管理”“学员培训电子档案”“培训结果分析”数据库汇聚成一个大数据库通盘分析,全面了解党外代表人士的知识结构和培训需求,深度分析党外代表人士的多层次需求。

(三)完善教学形式多样化机制,增强培训的吸引力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设备也为党外代表人士创造了教育培训的新平台,完善教学形式多样化机制要做到:一是完善线下与线上教育相结合制度。运用互联网资源和教育培训资源的有效结合,通过采取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采取线上教育+课堂教学、线上教育+案例教学,甚至是线上教育+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教学的方法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增强了培训的吸引力。如通过手机课堂、微信公众号等,通过以文字、图片、动漫、短片、视频等多种呈现方式给予学员感性认识,激发学员兴趣。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可以利用云计算、信息管理数据库的先进数据处理手段,将党外代表人士的个人信息、学习地点、青睐的学习方式、测试成绩、课程完成情况和互动讨论情况做个差异性的记录和分析,并定期进行跟踪,不断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培训信息档案。在此基础上定制个性化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在定制个性化的培训方案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下的特点,充分运用互联网的优势,将远程教学和课堂教学有机统一起来,做到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和同一性的培训方案相结合。

(四)健全沟通渠道多元化制度,拓宽师生互动平台

在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过程中,培训者可

以通过互联网在线协同,以边培训边协作调整的模式,让培训模式更具交互性。一是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搭建互联网交互平台,党外代表人士之间通过互联网学习平台进行交流,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随时随地与老师、其他学习者展开问题的讨论,教育培训者还要关注到每个学习者所提的问题,并通过学习系统相关软件整理出他们感兴趣的学习资料。在线教育平台管理者应当引导互动氛围的构筑,通过论坛、兴趣小组、微信群等方式实现广泛化互动,学员在各种智能终端都能够随时发表见解,授课老师及时了解学员反馈信息。^[7]二是进度控制与实时反馈相结合。在网络情景中,当学员打开网络学习资源开始学习时,网络学习资源中承载的知识信息和管理信息就传达给了学员,学员接收到这些信息,会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展状况对相应的管理信息进行操作、执行或反馈,从而实现对学习过程的即时管理。同时,学员也可以提交自己的反馈信息、记录学习的疑问,在学习完毕时,平台将根据学习进度、交互情况等给予简单的评价信息,以优化学员网络学习的感受。

参考文献:

- [1] 祈建民.信息化建设在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中的创新与发展报告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
- [2] CNNZC 发布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2016-08-03)[2016-08-03].http://www.cnmic.net.cn/ggw on/xwzx/rdxw /2016/20/608/t20160803_54389.htm .
- [3] 中研普华.2014-2018 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深度分析及产业链投资潜力研究咨询报告 [DB/OL].<http://www.chinairn.com/report/20140220/085928281.html>.
- [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Z].2012:6.
- [5] 姚庆荣,王建军,马小飞.甘肃省干部教育信息化建设研究 [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24).
- [6] 翟霞,冀翠萍.大数据背景下干部网络教育平台发展的困境和出路[J].理论学刊,2013(11).
- [7] 胡燕.大数据时代干部在线教育的发展路径[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2016(4).

编辑:鲍跃华

自由职业青年的生存现状、群体特征及对策建议

廉 思

摘 要:本文基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自由职业青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总结梳理了自由职业青年在收入结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以及压力来源方面的四大生存现状,研究分析了自由职业青年在社会参与、从业方式、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上呈现的“四化”群体特征,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开展自由职业青年工作的四条对策建议。

关键词:自由职业青年;生存现状;群体特征;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8)01-00041-07

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且少有研究的类别——自由职业者。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那些不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又区别于个体、私营企业主,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主要包括自由书画工作者、签约作家、独立演员、自由摄影师、网约车车主、SOHO一族、自由网页设计员等。该群体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势头与规模却越来越大,其社会地位和作用正日益显现,而且这一群体中绝大部分是青年。正视这一群体的客观存在,研究其生存状况、行为特征和思想状况,提出创新性的工作思路,更加紧密地将该群体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统战工作和群团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共青团中央的指导和

支持下,我们自2016年9月启动了此次调研,调研历时近一年,选取东部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部分自由职业青年为调研对象,不采用网络调查和电话调查,而是与自由职业青年面对面接触交流,保障了受访对象的同质性和调研质量的稳定性。同时通过走访多个省市的统战部门和群团部门,听取他们关于自由职业青年工作的经验介绍,力求掌握从自由职业青年到工作职能部门各个层面的第一手资料。具体而言,此次调研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江苏、浙江等12个省(直辖市)的自由职业青年为主,选取了不同性别、职业、年龄、学历、经济状况的人员为调查对象,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各职业类别中分别抽取一定数量的人员进行座谈和访谈。问卷分别从基本情况、经济状况、生活态度、职业倾向、价值取向、政治态度、社会参与等方面展开。本次调查

收稿日期:2017-12-18

作者简介:廉思,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共发放问卷 1000 份,收回 976 份,回收率 97.6%。深度访谈 147 人,举行座谈会 18 场。

对调查所得的问卷,课题组成员经过仔细核对后,对数据资料进行编码和录入,并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占比为 58.4%,女性占比 41.6%,汉族占比 94.3%。从年龄分布看,平均年龄 28.7 岁,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其中,人数最为集中的是 20~30 岁的年龄段,占比 64.2%。从职业分布看,此次调查占比最多的是自由书画工作者,为 23.4%;其次是自由撰稿人,为 14.1%;紧随其后的是自由摄影师,为 10.7%;独立演员、签约作家和流浪艺人占比分别为 9.5%、7.4%和 5.5%;最后,还有 2.9%的职业为独立制作人。调查中占比为 26.4%的其他职业类型中,较多的是按摩师、网约车车主、自由戏剧人、健身教练、自由音乐师等。

一、自由职业青年的四大生存现状

自由职业青年是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 40 岁以下的劳动者。从整体来看,自由职业青年是同质性较低、异质性较强的青年群体,是一个尚不成熟的、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群体,呈现出有知识、有专业、无单位、无组织的生存现状。

(一)收入结构上,以中等收入和生计型支出为主

调查显示,该群体年均收入 9.9 万元。其中,年收入为 5 万~10 万元的占比最多,为 38.1%;其次,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下和 10 万~15 万元的,分别占 28.9%和 15.6%;再次是 15 万~20 万元的,比例为 7.5%;年收入在 20 万~30 万元和 30 万元以上的较少,分别占比为 5.5%和 4.4%。整体来看,该群体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的占 71.1%,2015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每年 3.9 万元,测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为每年 6 万~12 万元。因此,该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占二成左右。

从该群体的日常支出来看,房租或房贷占比

最高,为 24.8%;餐饮占比第二,为 18.0%;再次为应酬和娱乐,占比 15.3%;然后为购置衣物和水电气及日常用品支出,占比分别为 8.0%和 7.9%。可以看出,排在前五位的基本上属于吃穿住用行,该群体的日常支出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而学习培训仅占 5.3%,整体呈现出“以生计型支出为主,发展型支出较少”的特征。

(二)居住条件上,较同辈群体优越,符合职业特性

调查显示,该群体有 28.8%的受访者自购楼房或单元房,18.5%楼房独租,17.4%和父母同住,15.6%与别人楼房合租,还有 6.4%为平房独租,其余选项比例均小于 5%。从整体来看,该群体自购房屋占到三分之一(32.2%),加上与父母同住的 17%,以及单独租房的 25%,根据课题组之前所做的有关青年住房问题的调查,该群体居住条件明显优于大城市同辈青年群体。总体来看,该群体的居住条件在大城市青年中处于中等偏上位置。

自由职业青年通常无固定工作单位、无固定工作内容,根据自己的技能自主地寻找服务对象,并根据服务对象的要求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地,该群体拥有“工作时间自由支配”“工作环境自由支配”“工作内容自由支配”的特点。因此,其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服务对象,也都因需而变,很多自由职业青年的住所即是办公场所。因此,居住条件的相对优势,有利于自由职业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社会保障上,制度保障缺失,社会风险较高

当前我国制度性保障体系仍不完善,难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有效缓解区域失衡和城乡失衡问题仍需时日。这一现状使“体制外”自由职业青年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滞后于“体制内”。从自由职业青年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来看,现存的几近温饱式的社会保障很难满足其实际需求,同时,社会保障的体制化、属地化、户籍化特点,又制造了许多天然瓶颈。在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中(满分 5 分,均值 3 分),该群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都低于一般水平,为 2.91 分和 2.79 分。在深访中,很多自由职业青年都表露出了对此

问题的关心。现在有些地区和城市已经出台了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险政策,自由职业青年可凭个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加社会保险,以当地上年度社平工资作为缴费基数,养老保险按缴费基数的20%缴纳。然而自由职业青年社保意识淡薄,参保比例并不高,他们认为自已尚且年轻,不需要缴纳保险。同时,其对现行的社会保险政策不了解和保险费的较高标准,使他们很少主动选择参保。

(四)压力来源上,经济工作压力、预期发展压力、社会文化压力并存

调查显示,自由职业青年压力感知水平适中,41.7%认为压力一般,只有10.1%认为压力非常大,8.9%和7.4%的认为压力较小或没有压力。在对压力来源的进一步调查中,有39.7%的受访者表示压力来源主要是经济方面,另外还有30.2%的来自工作方面,其次是生活/保障方面,占比9.3%,其余方面占比均低于5%。可见,经济和工作是压力的最大来源,总占比达到近70%。其次,预期发展的压力也较大。调查显示,该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有31.4%的受访者表示是发展提升方面。由于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既有知识和技能迅速贬值,导致竞争压力和生活压力增大。由于缺少单位和组织的保障,自由职业青年普遍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对自己的前途有一定程度的担忧。最后,在深访中发现,该群体还面临社会文化认同的压力,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主流社会成员对他们从事的职业缺乏理解和宽容,甚至产生一种普遍的歧视,认为他们是一群“不务正业者”。

二、自由职业青年的“四化”群体特征

(一)社会参与上呈现“逆组织化”选择

自由职业青年脱离组织机制的束缚,运用自己的技能,而不是某种物资,来换取金钱,获得生存的自由。他们的“逆组织化”行为能够透视出现代组织形式的利弊,同时也昭示了现代组织发展的新特点与趋向。

1.组织参与程度低

该群体组织参与意识低,在政治组织、宗教组

织、社会组织中的参与度都很低。在政治面貌方面,占比最多的是群众,为41.7%;其次是共青团员,占比为31.8%;再次是共产党员,占比为19.5%;而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比例分别为5.4%和1.4%。在宗教信仰方面,无宗教信仰的占82.2%,除去本土佛教信仰较高(13.2%)外,其他的比例都很低,信仰基督教和道教占比分别为2.2%和1.3%,信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占比为0.3%和0.2%。在参加了相关组织或团体的受访者中,有近一半(46.1%)的受访者表示,只是偶尔参加组织或团体举办的活动,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虽然加入了某个组织但从不参加活动;另外,有14%的受访者参加活动频次为每月1次,8.7%每月2次,5.6%每周1次,而参加活动较频繁,每周若干次的仅为3.5%。可以看出,该群体参加组织活动的频次不高,参与程度低。

2.参与类型为“兴趣型、行业型、志愿型”

该群体中有五分之一左右(21%)参加了兴趣类的社会组织,比例最高;其次,有18.6%的受访者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或群体;再次,有15.8%的受访者参加了行业组织,15.4%参加了公益志愿组织;另外,还有12.3%参加了同学组织,9.4%参加了网络组织;其余组织参加人数占比较小,均低于5%。由此可见,该群体参加组织较为分散,占比较多的组织类型为“兴趣型、行业型、志愿型”。在对参与组织的原因调查中,43.3%的受访者表示参与原因为丰富业余生活;其次,获得精神寄托和社会支持的分别占比17.8%和17.0%。

3.现实空间游离,网络互动频繁

在政府公共事务参与方面,有27.3%的受访者通过行业协会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占比最高;其次,通过所在社区和依靠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参与的分别占比18.1%和17.7%。总体来看,公共事务方面参与不多,存在“体制外游离”状态。同时,该群体在网上看到群体性事件时,有47.7%的受访者表示会点击浏览此新闻,与身边人讨论新闻的占比14.5%,在线发帖或跟帖参与讨论的占比4.9%,提供与此新闻相关线索的占比

3.5%, 转帖并传播此新闻的占比 2.9%, 可见, 该群体在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 比现实空间中要活跃得多。在对网络相关经历的调查中发现, 有 26.2% 的受访者有其他类型的社交经历, 24.6% 的受访者在博客/论坛中所发文章或帖子曾被大量转载或回帖, 18.6% 的受访者在微博中评论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 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 另外, 自己制作的视频被大量下载或浏览的占比 12.0%, 通过代理服务浏览境外网站的占比 11.2%, 担任某知名论坛版主的占比 7.3%。总体来看, 该群体对于网络的运用非常娴熟, 网络社交相关经历也比较丰富和多样化, 在网络中发声较多。

(二) 从业方式上呈现“专业化”生存

调查发现, 该群体所从事的行业多数是服务业, 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都有存在, 如果按照受教育情况分析, 理工科及经济等专业的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 人文社科等多为生活性服务业。他们以专业技能和专业特长为基础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发展。

1.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调查显示, 该群体中本科生人数最多, 比例为 53.7%, 占总体的二分之一; 其次是大专学历, 占比为 23.1%; 再次是研究生学历和高中学历, 比例分别为 10.9%、10.3%; 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较低, 分别为 1.5%、0.5%。因此, 该群体专科以上学历占比 87.7%, 反映该群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呈现“受教育水平高, 以本科为主”的状况。

2. 具有社会需要的技能

该群体的“自由”建立在专业特长的基础上, 具备了某种专业特长, 无须与单位签订长期的契约关系, 能在社会中不断发现新的工作机会、真正做到职业的自由。深访中发现, “知识就是力量, 奋斗成就梦想”是自由职业青年普遍认可的价值准则。他们笃信知识的价值, 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 大多是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府、运用知识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并且大多通过专业知识在所处的领域得到自我实现和社会尊重。这些专业特长既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 如自由作家、自由

撰稿人等, 也可以通过某些专业技能培训获得, 如健身教练、动漫创作人等等。

3. 以专业性劳动获取报酬

该群体提供的是具有一定知识含量、精神性、服务性的生产劳动, 根据所需技能的不同获取相应报酬。由于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谋生, 所以该群体对个体发展的诉求比较强烈。该群体期望得到的帮助类型,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为期望提高收入; 其次, 有 18.0% 的人期望稳定的生活; 另外, 期望得到人脉资源、平等的发展机会、丰富的就业信息等分别占比 6.6%、6.5% 和 5.6%。

(三) 社会结构上呈现“边缘化”形态

自由职业青年重视个人的自由与个性, 追求工作的创造性和成就感, 工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 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 该群体尚未处于社会的中心, 受社会关注度不高, 主要集中在党外、体制外, 共同的组织难题是人难找、人难统、人难聚。

1. 社会政策中的“盲点”

调查发现, 很多城市的医疗制度、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和教育制度等, 都把该群体排除在外, 他们遇到困难时不知道向谁求助和如何求助。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该群体占比最高的维权途径是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司法机构, 为 39.9%; 其次, 是本地政府, 占比 16.3%; 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占比较少, 仅为 4.3%。总体来看, 多数的维权途径是通过司法机构, 虽然是一种合法的维权渠道, 但缺少弹性的沟通协商机制, 采取这种终端维权手段, 也显示了他们的无助和无奈。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会把单位、老乡、家人等作为首要选择, 通过社会力量来达成问题的解决, 只把法律手段作为最后途径, 以降低自身的维权成本。

2. 社会交往上的“内循环”交流

自由职业青年在社会交往上以专业性较强的“内循环”为主, 群体内形成了一个认同度较高的小圈子。除了职业圈, 各种基于学缘、趣缘的圈子也比较活跃。在圈子内部, 以线下交往为主, 经常以沙龙、茶叙、座谈、乐跑、穿越等形式聚会, 抱

团取暖,组团取乐,对团组织的活动参与不多。实际上,自由职业青年的“圈层化”不仅仅依托于表面的家族和地缘等关系,更是内化于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具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和自觉行动力。

3.群体认同中的“小众”群像

该群体的边缘性还体现在群体认同上。调查中很多人表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为社会大众所理解,访谈中很多自由舞蹈工作者提及了被社会歧视的问题。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该群体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千差万别,造成了群体自身认同的缺乏,使得整个社会感受不到群体的力量和群体的存在。自由职业青年在自己的空间中生活、工作,单枪匹马地闯天下,表现出较弱的群体性。缺乏共同的群体利益、普遍认同的群体文化、共同的群体意识、比较完善的群体组织(工会、协会)和群体代言人。

(四)价值观念上呈现“中立化”摇摆

调查显示,自由职业青年对党和政府有信心,对主流意识形态较为认可,例如,对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强大的评分为4.05分(满分5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大于引发的问题评分为3.89分(满分5分)。对于本届党和政府的最大特点的感受,有32.6%的受访者表示为更有力的反腐手段,其次认为有更强烈的改革意愿的占比23.9%,认为有更亲民的执政姿态的占比20.7%;另外,认为更严格的依法治国、更强硬的外交话语的分别占比9.0%和6.4%。但在深访中我们也发现,自由职业者对手中的财富有较强的不安全感。由于不具有“体制内”的身份,他们担心政府的某一个决策会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对社会现状带有一定批判性,尤其是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制度设计极为关注,如司法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社团注册制度以及新闻制度等,并需要更健全的法治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欢迎渐进式的改革,期待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希望中国的发展始终在良性的轨道上稳健运行。

1.对党和国家发展充满信心

调查显示,在面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时,该群体对于信息来源的信任度存在差异,但该群体最信任的信息来源均为政府信息源。对于我国实现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有近半数(49.3%)受访者的态度比较有信心。在中西方治理体制的比较方面,占比46.2%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吸收西方体制的一些优点,中国的治理机制更有前途,仅有5.3%的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好的治理机制。此外,对于2013年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有34.9%的受访者认为党和政府的作风有很大改善,相信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好;29.7%认为有很大改善,但长期效果还有待验证;另外,还有20%的认为有所改善,会变得更好;10.2%的认为只是暂时有所改善,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反弹;只有少数人认为没有改善或恶化。

2.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存在担忧

在对宪法认识上,该群体有24.3%认为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需要加强;23.1%认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需要加强;此外,认为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需要加强的占17.1%。此外,该群体很多人认为在我国基层政府机构和政治运作中,超越规章制度的“潜规则”比较普遍(总分5分,评分3.53分)。在对不公平现象的看法上,有37.0%的受访者表示存在因权力导致的不公平,其次有24.9%的受访者表示存在因职业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再次有15.8%的受访者表示存在因行业导致的不公平现象。权力、职业、行业的不公成为自由职业青年最看重的方面。

3.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认知存在错误理解

对于政党执政基础的认识方面,47.7%的受访者认为应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绩效上,排名最高。深访中也发现,自由职业青年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趋向于用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来评价。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深,对于两者优劣的评价也主要是

从当前的发展功效出发,更多地将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合理性及优越性归结为共产党现在“搞得还不错”,并没有真正从历史、现实、理论的角度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判断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三、开展自由职业青年工作的四条对策建议

(一)摸清合理诉求,为开展自由职业青年工作创造有序政治参与条件

一是多数自由职业青年希望建立能代表自身利益的行业协会。可以通过这种团体组织来加强与党和政府的联系,反映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诉求。要积极引导、支持、鼓励自由职业青年群体建立一些能够真正代表自由职业青年群体的民间组织,如演艺人员协会、自由撰稿人沙龙等。二是在继续做好自由职业青年精英参政的同时,更加关注自由职业青年草根参政的需求。为那些政治素质高、专业造诣深、社会影响好的自由职业青年草根人士参加各级人大、政协、青联等创造机会,进行适当安排;对确有专业才干而又符合任职条件的,积极推荐他们到相关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任职挂职兼职,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三是推动政治资源由“增额供给”向“议事供给”转变。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是在国家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实现的。在这一前提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联委员等名额相对有限,按照简单增加名额的配给方式赋权自由职业青年,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可以尝试探索议事政治资源的供给模式,即以议题为核心的申请式政治参与,扩大自由职业青年的政治参与渠道,推动政治资源供给模式的转变。四是要保障自由职业青年表达合理诉求的权利和渠道。要不断丰富协商民主形式,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咨询听证、协商谈判、议事票决等制度,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为自由职业青年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

(二)完善政策机制,为开展自由职业青年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在开展自由职业青年的工作中,一方面应完善补充法规政策的缺位,另一方面应加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政策之间的衔接配套。建议协调有关政府部门,制定并完善自由职业青年人才流动、职称、户籍、薪酬、保险、培养、激励等一系列政策,为自由职业青年成长提供制度保障,提高自由职业青年的职业归属感,增强自由职业青年在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力。具体而言,在人才流动方面,要完善各类人才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流动机制,结合事业需要使自由职业青年有更多元化的流通渠道;在职称评定方面,将自由职业青年纳入当地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化评审范围,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可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称;在户籍管理方面,打破身份、所有制限制,放宽户籍准入政策,推广以引进自由职业青年高级人才为主导的“工作居住证”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属地管理原则,将自由职业青年纳入“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保障体系,并研究制定富有特色和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产品;在人才培养方面,将自由职业青年纳入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依托各类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团校、高等院校等开展对自由职业青年的培训,组建“根基在我”的舆论场、微信群和朋友圈。同时,实现政府对自由职业青年培养的持续投入;在表彰奖励方面,探索建立专门针对自由职业青年的表彰奖励制度,将自由职业青年纳入政府奖励范围,在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时候,给予自由职业青年相应的名额和比例。

(三)积极改善环境,为开展自由职业青年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切实落实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和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营造有利于支持自由职业青年成长成才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一是营造平等的政策环境。在人才政策上统一安排,对于政府奖励、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要统筹合理安排;在公共资源运用上

平等开放,面向社会的资助、基金、教育培训、人才信息库等要考虑自由职业青年各类人才;进一步加快职能转变,支持和鼓励自由职业青年参与项目申请、课题招标、成果申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使自由职业青年有钱做事,以事兴业,以业育人。二是强化积极的服务环境。建立完善的人才服务体系,培育若干专门的自由职业青年人才代理服务机构,提升其服务自由职业青年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专业化、信息化和产业化的方向,从自由职业青年的需求出发,积极为其提供信息咨询、人事代理、人才招聘、智力合作、柔性流动等服务。三是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对自由职业青年中存在的思想认识分歧,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放任自流。对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非原则性问题,应给予宽容理解;对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应及时化解。要充分认识到,自由职业青年的工作既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人情味很浓的工作,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耐心细致、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当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或出现思想反复时,不能急躁埋怨,不能急于定论,仍要满腔热情地做好教育引导。四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加强自由职业青年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各地自由职业青年工作的先进经验,对自由职业青年的创新创业精神予以鼓励,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充分肯定,对其中优秀代表人士的先进事迹大力表彰,让全社会都能够关注自由职业青年的发展。

(四)坚持放管并重,加强自由职业青年的规范管理

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既要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积极培育扶持,又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自由职业青年健康有序发展。尽管有相当部分自由职业青年具有流动性,但是他们在社区居住,与社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社区里蕴涵了丰富的联络资源,要发挥社区在自由职业青年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

社区治理格局。要增强自由职业青年的社区认同感,使自由职业青年在社区得到组织的关怀和社会的理解,使其有家的归属感。应加强社区的信息化建设,建立沟通交流、生活服务等综合性信息平台,实现工作信息和居住地信息无缝衔接,打造“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提高自由职业青年管理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探索自由职业青年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机制,支持自由职业青年在服务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团体标准、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相关管理部门要将自由职业青年纳入各自管理范畴,加强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配合协助登记管理机构做好对本领域自由职业青年的登记造册,实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建立自由职业青年的“异常名录”和“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对自由职业青年中的重点人员建立等级评分制度。民政、外交、公安、网信、文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对自由职业青年涉及本领域的事项事务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实行双重管理的业务主管单位,要对所主管自由职业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收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切实负起管理责任,每年组织专项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查处自由职业青年中个人或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自由职业青年建立诚信承诺制度,建立行业性诚信激励和惩戒机制。支持自由职业青年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自由职业青年建立活动影响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探索建立自由职业青年各领域行业自律联盟,通过发布公益倡导、制定活动准则、实行声誉评价等形式,引领和规范自由职业青年的行为。

编辑:郭晓东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案例的分析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摘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不断增长、影响不断增强,对其开展统战工作具有紧迫性。具体到浙江,其中的网络界人士、律师、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外资企业管理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五类是重点群体,过去的工作已在组织建设、平台建设、队伍建设方面实现部分突破,并有一定经验,但总体上仍然存在着四种难题、三个压力、六个缺乏,为此必须进一步明晰思路、改革方法、加大力度,通过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工作进一步强化对这一群体的引领团结,凝聚他们共同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1-00048-07

一、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点群体及其统战工作情况

浙江省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起步较早、探索较多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网络界人士、律师统战工作方面,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当前和下一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重点抓好若干重点群体,先行打开局面、积累经验,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基础。结合浙江实际,重点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开展了统战工作实践探索的网络界人士和律师,另一类是尚未大规模开展工作,但实际上已经有较大数量、较大影响的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外资企业管理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

(一)网络界人士

这部分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分布广泛。其职业分布十分广泛,既包括政府官员、高校教师,也包括农民、工人、银行职员和大学生。二是政治素质强。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自觉传播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稳定,通过有序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三是知识水平高。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部分人群甚至拥有海外留学经历,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批判精神,对行业发展或政治经济社会事件的理性分析与见解,使他们具有了凝聚和引领的代表性;在重大影响事件的大众传播过程,能够用自身的知识素养、理性分析,作出判断,是行业中成熟、知性的群体。四是身份的隐蔽性。这些人士在网络中发表言论和

收稿日期:2017-12-15

表达意见主要采取匿名身份或者以“昵称”的名义进行,除了极个别网络意见领袖会随时间推移而暴露真实身份以外,大多数并不知晓彼此的真实身份。

(二) 中介组织从业人员

浙江省中介组织较为发达,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有5万余人。其中,律师事务所1285家,从业人员近1.6万;会计师事务所383家,从业人员1.3万;税务师事务所185家,从业人员7863人。这个群体包含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来源多样化。包括律师行业、会计师行业、税务师行业、评价师行业,涉及各行业协会营利性中介组织和非营利性、服务性中介组织。二是竞争意识强。就业基本上依靠自身的专业技术优势,独立面对市场竞争,因此在择业方面具有很高的自由度。他们相对比较独立,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三是政治诉求高。集聚了专业精英,学历和收入较高,独立性强,参政议政意愿最为强烈。

(三)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浙江省是非公有制经济大省,私营企业有129.2万家,注册资金54159.8亿元,注册资本1000万以上的企业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5万多家。据估算,浙江省拥有280万私营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占全省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97.7%。这个群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学历和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学历从海归博士到高中毕业,收入从数十万到数万,情况千差万别。二是自身地位认知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他们大多认为自身是弱势群体,吃人俸禄、替人干活,要听从企业主的安排,对自身期望不高,政治参与取决于企业主的态度。三是工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职业的不稳定性、竞争的激烈性,加上工作强度和压力巨大,使得这一群体普遍具有紧张感和焦虑情绪,对前途和未来常常感到迷茫甚至恐惧,对自己的身份缺乏归属感。四是政治参与热情比较高涨,期待得到党委政府部门的关注。省工商联的调研表明,接近一半受访人员将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选择参加人大、政协的占32.8%,

选择担任行政职务的占23%,选择加入社会组织的占18%,选择加入工商联的占16.4%,选择加入民主党派的占11.5%。

(四) 外资企业管理人员

据初步统计,浙江省外资企业管理人员有6万多人。其特征如下。一是学历较高。调查显示,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学历程度普遍较高,大多数为大专以上。其中少部分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对国情了解不深。二是政治认同感强。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方针等认同感较强。三是自我满意度较高。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自我满意度总体较高,鲜有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状况表示不满的。四是阶层意识较弱。从调查情况来看,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对自己属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对自己属于新社会阶层这一事实感到茫然甚至不解。相比较而言,外资企业技术人员群体的阶层意识和阶层自我认同比管理人员群体更弱。

(五) 部分自由职业人员

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长“草根”,生活自由。他们流动性大,社会认同感较低。在工作地点、时间安排和工作方式等方面,都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以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大多掌握一技之长,独立意识强,群体性差。不靠政府、不靠单位,靠自己的就业理念,使他们自立、自主意识强,有开拓创新意识,信息拥有量大,工作热情和韧性比较足。三是绝大多数拥护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对提高政治待遇有较大的诉求。相对而言,自由撰稿人、艺术工作者、演艺界人士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社会影响的人士应成为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

二、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主要经验——以网络界人士为例

(一) 抓住重点群体,率先在部分领域取得突破

浙江省自2013年在温州市、台州市开展网联

会建设试点,围绕“网络界人士统战工作做什么、怎么做”的主线,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推进,在实践中破题解难、探索推动这项工作。确定了“三为主、两兼顾”的策略,“三为主”是指以体制外为主、以党外人士为主、以具有较大影响力或处于上升期的网络界人士为主;“两兼顾”是指红色、灰色兼顾,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即搭台的和唱戏的)兼顾。我们根据主动接触、及时介入、积极培养的工作原则,努力把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网络界人士大部分处于体制外,很多人对于网络管理、社会责任等问题都存在模糊认识。针对网络界人士的思想特点、情感需求,浙江省探索开展多途径、全方位的政治引导。

(二)坚持重心下移,全面推进各类知联会组织建设

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新阶层人士在哪里,知联会组织就要建到哪里,统战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全省通过培育基层知联会、新联会等“小组织”,使新阶层人士能够就近吸纳,实现知联会组织“密织网、广覆盖”,建立起与基层群众紧密联系的组织网络。自 2011 年以来,全省在实现知联会省市县三级覆盖的基础上,将统战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把基层知联会、新联会建设作为新的创新点,提出要在有新阶层人士的基层单位中实现基层知联会、新联会组织和统战工作的全覆盖。2011 年 6 月,省委统战部下发《关于加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逐步实现党外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社区、学校、企业全面建成知联会组织”。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知联会组织 1404 个,其中基层知联会组织 975 家(私营企业知联会 152 家),新联会 70 家,网联会 49 家,社会组织知联会 3 家,成员总数超过 4.8 万人,最大限度地把新阶层人士纳入组织中来。2016 年 3 月,全省启动争创“百家精品知联会(新联会、海创会、网联会)”活动,鼓励各类知联会强化组织功能,创新性开展工作,积极打造精品组织。

(三)加强部门合作,探索建立各项工作机制

新阶层人士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行业协会。能否打破各自为战的格局,发挥统战部门的牵头协调作用,是对统战部门的挑战和考验。2006 年,浙江省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包括省律师协会、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注册税务师协会等 10 家单位。自 2014 年以来,浙江省委统战部与省司法厅联合开展律师行业统战工作,与省民政厅联合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初步形成工作合力。目前,浙江省委统战部已经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省委“两新”工委、省委宣传部、省经信委等 14 家单位,明确各自职责和分工,初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各有关部门支持配合的工作机制。全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系)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形成共同研究、共同推动统战工作的良好态势。浙江省有些地方已经把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 25 家非公有制企业、12 家社会组织建立基层统战部或联络处,确定了 47 名统战工作联络员,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统战意识,把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落到实处。

(四)明确培养目标,推进各类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浙江省坚持“三个纳入”的原则,给予新阶层人士“同等”待遇,甚至“优待”,有力支持和推动新阶层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各级统战部门及时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类群体代表人士纳入各级党委座谈协商的对象之中,纳入统一战线教育培训的对象之中,纳入统战部门政治安排的对象之中,为新阶层代表人士提供发展平台。全省新阶层人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 人,担任省政协委员 18 人、省人大代表 37 人。其中,网络界人士担任省政协委员 2 人,市政协委员有 37 名,成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积极力量。广泛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加入知联会(新联会、网联会)为什么、历史责任是什么、我为浙江‘四个全面’做什么”大讨论活动,加强对新阶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引导。省委

统战部通过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训班、网络界人士培训班,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引导;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中国新时期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国内首个新阶层人士学习交流培训基地,举办新阶层大讲堂,取得良好效果;以综合评价为保障,提高新阶层代表人士培养使用的规范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自2011年以来,浙江先后在台州市试点开展新阶层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在温州市试点开展网络界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在台州市仙居县试点开展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等,根据不同群体特征,科学设置评价指标,把评价结果作为政治安排、社会安排和荣誉安排的前置程序。组织新阶层人士参加“感恩三老慰问两户”、同唱红歌、爱心拍卖活动,开展红色之旅等各类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全省组织实施网络界代表人士“十百千工程”,争取通过三年的时间,实现省市县三级重点培养十名、百名和千名网络界代表人士的目标。

(五)着力发挥优势,搭建发挥作用的有效平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通过搭建各类平台,特别是发挥基层知联会、新联会联系群众最密切、服务群众最便捷的功能优势,让“小组织”切实发挥大作用。近一年来,各地网联会通过建立网络建言献策直通车、网联会委员工作室等,共收集提交了3260多条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在网联会的参与建议下,温州市、温州龙湾区、临海市政府相继出台了扶持网络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仅温州龙湾区每年就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扶持资金5000万元以上。台州路桥区新联会开展慈善医疗救助千名“新台州人”活动、捐建全省首个“新联会小学”,苍南县新联会开展“乡村读书计划”,临海市网联会结对帮扶残疾青少年活动等,都赢得社会广泛好评。各级网联会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产业转型升级、环境整治等方面,积极引导、平衡网络声音,维护了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三、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从统战工作对象看,有四方面的难题

一是界定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虚拟性、流动性、多变性,真实身份的认定有相当难度。尽管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分类已经有了总体上的解释和说明,但具体到实践,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二是找人难。很多统战对象是隐藏着的,最为典型的是自由职业人员。由于没有固定的单位,高度分散,流动性频繁,基本情况不易掌握。从各地调查情况看,由于过于分散,自由职业人员未能纳入政府部门管理范围,难于彻底统计清楚。统战部门对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到底有多少人、是哪些人、人在哪里等知情不多。

三是破局难。绝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未进入统战工作的视野,开展的统战工作覆盖面不广,交到的朋友不多。认人、牵线、交友是统战工作的基础性工作。认不出人、牵不上线、交友不多,无疑表明这方面的统战工作总体还未破局。

四是工作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打破了传统社会职业的稳定性结构,他们分布比较广泛,岗位流动性强,经常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之间频繁流动,其内部分化组合的时间和速度是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所不能比的。这就给以原来意义的单位、组织为基础开展的统战工作带来了挑战。特别是思想工作做不下去,水过地皮湿,甚至如水浇石。

(二)从统战工作主体看,有三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转变观念压力大。一些基层统战部门对于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比如,有的认为组织越多,麻烦越多。传统的统战组织平台已经够多,没有必要再成立新的组织,比如已经成立了知联会,就没有必要再成立新联会、网联会等。有的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一直有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在管理,出了问题也有法律去管理去规范,统战部门没有必要再叠床架屋,去“凑热闹”。有的认为新阶层只会听有职权的部门,统战部门缺乏硬手段,管了也白管,管了也没用。比如网络界人士,他们只会服从网信、网警管理,统战部门再努力也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

二是力量动员压力大。在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单位中,由于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的原因,党建工作、工会工作等搞得有声有色,党员同志能够深入参与其中,党外人士却找不到组织,没有参加活动的平台。许多基层党组织和负责人还不清楚自身肩负的统战工作职责和使命。

三是分类施策压力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历不同、视闻有别、见解各异,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包括处事态度都不尽相同。有行政主管单位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组织、有人员、有活动、有制度,且规章制度执行落实得好,思想工作抓得牢,能够经常性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没有行政主管单位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管理上则比较散漫,在集体活动上开展得较一般。如律师和会计师两个行业就开展得比较好。自由职业人员则比较混乱,且统战工作主体难以确定。因此,要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区别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个性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区别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个性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的基础上。

(三)从统战工作方法看,有五方面的短缺

一是缺动力。一些基层统战部门仍然满足于做好传统领域的统战工作,对于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一种是麻烦论。认为组织越多,麻烦越多。传统的统战组织平台已经够多,没有必要再成立新的组织,比如已经成立了知联会,就没有必要再成立新联会、网联会等。一种是多余论。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一直由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在管理,出了问题也有法律去管理去规范,统战部门没有必要再叠床架屋,去“凑热闹”。一种是无用论。认为新阶层只会听从有职权的部门,统战部门缺乏硬手段,管了也白管,管了也没用。比如网络界人士,他们只会服从网信、网警管理,统战部门再努力也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

二是缺渠道。跟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交朋友,对这一新阶层人士团结、引导、帮助和服务,必须要有渠道。渠道越多,则接触、引导和帮助的机会越多、效果越好,党与这一新阶层人士

的感情才越深,党对这一新阶层的统战工作才越成功。从目前来看,各级党组织与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联系和交友渠道是很少的,主要局限于次数甚少、参加人数也很有限的培训和开会等,很少有频率较高、互动程度较深、能深入交流乃至交心的渠道和方式。

三是缺组织。组织起来,不仅是我们党领导群众的好方法,也是我们党开展统战工作的好方法。与非公有制企业主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律师群体、会计师群体有一个或多个专属于自己的组织网络不同的是,专属于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组织网络至今未建立起来,或者虽有但覆盖面不广,或者像北仑大港社区那样建立了面向所有新社会阶层人士而非专门面向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组织网络。在这一新阶层中,部分人士是基于自己的民主党派成员、知联会等其他身份而加入民主党派等其他组织网络。虽说各地有市、县(区、市)两级科协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对口,前者可谓后者的娘家,但事实上,科协更多覆盖的是高校和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以及少数大的私营企业,多数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是极少与科协有关联的,极少成为市、县(区、市)两级科协的组织成员。

四是缺代表。载体和平台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一个思想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的领军人物的积极带动。当前,由于一些新阶层组织的负责人忙于个人业务,对于广大成员的思想沟通不够及时,诉求回应不够迅速,工作生活不够关心。即便偶尔组织活动,也只是“开开会议、搞搞公益”这样一套陈旧的模式,对新阶层人士的吸引力明显不足,甚至导致一些平台和载体搭建以后,便马上进入“休眠”状态。

五是缺方法。目前,浙江省网络界人士统战工作以“座谈会、开讲座、培训班”等传统方法为主,这些方法曾经在统战工作的实践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针对网络界人士这一新的群体,传统的工作方法显然已捉襟见肘。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网络呈现开放性、无界性、互动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

征,这给统战工作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网络界人士的工作特点、群体特性、思想特征等,也决定了统战工作方法必须要有新的突破。

四、下一步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主要方法和重点工作

(一)摸清底数、明晰思路是前提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基本前提是全面掌握各个层级工作对象的数量、特点、需求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思路明确。中央统战部八局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加强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掌握情况。这项工作从中央到省、市、县可同步开展,方便资源共享,为下一步分类建好数据库打下基础。

(二)建立组织、搭建平台是保障

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特点,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工作,既是统一战线的传统,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坚持以社团为纽带、社区(单位)为依托,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组织是最重要的平台,是其他一切载体平台的依托和依靠,或者说是“载体中的载体”和“平台中的平台”。以新媒体从业人员为例,假如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网络界人士联谊会),那么我们的统战对象仍然是“一盘散沙”,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建设教育、活动、交流等载体平台的意义。因此,要把重点群体的组织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努力为载体平台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社团是建立在自愿参与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其约束力比行政干预更有效果,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各类社团组织,有利于加强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畅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利益诉求渠道,增强工作的实效性。社区(单位)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生活、工作相对固定的场所,特别是对自由职业者、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现有社团组织无法延伸的群体,依托社区、企业有关党团组织或工会加强联系,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统战部门要加强对相关社会团体的管理与协调,加

强与有关社区(单位)的联系与指导,不断扩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面和统战工作覆盖面。

要注重发挥民主党派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这些人员本来就是各民主党派联系的对象。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与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接触,大多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新阶层的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吸引力。民主党派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思想政治工作系统,通过民主党派把政治素质好、层次高的代表性人士吸收到组织中来,在现有政党格局中为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就能通过民主党派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实现党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领导。

在建立平台载体方面,要实施“品牌化”战略,努力扩大载体平台的影响力。品牌就是名片,是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影响力、增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上台阶、出成果、有影响,就必须走品牌化的道路,定期开展有针对性、参与性强的品牌创建活动。在载体和平台的建设上要有主题、有理念、有追求、有梦想,要着力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个人的追求与社会担当结合起来,让个人在集体中升华。要注重结合各自的地方特色,大胆实施“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乃至“一村一品”战略,着力深化细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着力挖掘和打造出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载体平台。

(三)培养代表、强化队伍是关键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庞大、素质参差不齐。要在这部分群体中推动主流价值观、群体价值观的形成,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责任感,必须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代表人士队伍,通过他们去更好地团结和联系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纳入各级党委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以有较高政治素质、较大社会贡献、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在所联系的阶层中有较大影响为标准,参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综合评价,探索建立相应的

评价体系,有重点地进行培养选拔。同时,适当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数量。聘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担任人大和政协专门委员会特邀委员,推荐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为他们的健康成长铺设台阶。

(四)沟通引导、增强认同是重点

要建立多样化的政策渗透平台,达到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自觉转化的目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定的政治认知度,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现状的理解往往容易浮于表面和片面,对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能都是“一知半解”。因此,对他们的统战工作关键在于“正心”,即政策的渗透和理解的释疑,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借助工作机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家底、现状和愿景做到“全面性的了解,深刻性的体会”,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五)真情服务、解决问题是支撑

相对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体制外特点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政治参与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对较少。为此,统战部门要发挥协调作用,在党委政府和各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搭建有效桥梁,使他们能够接近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获得沟通渠道,顺利解决有关问题,并为其事业发展积累一定的人脉关系,这既客观上增进了政府服务的质量,也提高了统战工作影响力。比如,在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方面,要着眼于他们的发展,做好信息服务工作,提供各种技能培训,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实际帮助,同时要积极建议相关部门完善相关政策,帮助自由职业人员妥善解决职称评审、子女读书、社会保障等实际问题,解决自由职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保护其合法利益和工作的积极性。

(六)明确职责、科学分工是后盾

2016年7月,中央统战部设立第八局,专门负

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各级统战部门也应增设相应的工作机构,并落实人员编制。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协同统筹、各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统战工作格局,统筹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坚持“属人、属业、属地”管理服务相结合,充分挖掘和整合区域资源,依托各级党组织、统战部门、人民团体、业务主管部门或行政挂靠单位,形成省、市、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机制,促进统战工作延伸到各个社会组织,实现上下内外、部门之间、网上网下、新老领域联动。同时,联席会议是一种协调议事机构,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研讨交流和协调合作的平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能,积极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及时研究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七)结合党建、借用外力是捷径

在统战力量有限、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借用各方外力共同开展工作是一个较好选择。各级党委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经常检查,抓好落实。特别是“两新”党的组织,一定要做到党组织建设全覆盖,一定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党建工作内容,搭建有效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更加有效。再如在网络界人士统战工作方面,统战部与宣传部的工作分工、协调是一个重要途径。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联系、沟通、管理、引导、培训等是宣传部一直在做的工作,新媒体代表人士对宣传部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已很强,统战部和宣传部若能加强沟通互助,利用已有平台共同开展工作,定能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和提高统战工作效能的目的。

编辑:郭晓东

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调查与分析

——以上海市 S 区为例

王俊华 郑佐华 狄正华

摘要: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思想具有多变性、多元性与多层性,其研判也应是多维度的。从政治认同、价值取向、政治参与、利益诉求和社会责任等维度进行考察,上海市 S 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整体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进步意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分类来看,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城市认同相对偏低;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注重安全感、更倾向西方价值观;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普遍对宗教持宽容态度,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加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建立工作机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长期化、制度化;二是关注企业家需求,政治引导寓于助推企业发展、自我实现之中;三是优化教育培训,分层分级分类开展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四是融入大党建,创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关键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1-00055-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也不断成长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谈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时,强调“要关注他们的思想”,“同他们交思想上的朋友”^①。

加强研究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

何谓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早在 2007 年,辜胜阻教授根据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的时间为标准,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对国内企业家进行代际划分。辜胜阻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之后,1992

收稿日期:2017-12-10

作者简介:王俊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郑佐华,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狄正华,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统战部副调研员。

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有柳传志、鲁冠球、年广久等,他们大都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戴着“红帽子”。第二代企业家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诞生的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有陈东升、毛振华、田源、冯仑等,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清晰。第三代企业家则是诞生在 2000 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的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有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②在辜胜阻教授研究基础上,我们将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界定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新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为了解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课题组向注册地在上海市 S 区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发放了 3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30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举行两次座谈会;对本区域 25 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一手定性资料。问卷调查样本中,性别比例方面,男性占总样本的 80.7%,女性占比相对较低,只有 19.3%。反映出男性在创业和领导非公企业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年龄结构方面,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年纪轻,毕业后直接创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年龄最大的 46 岁,最小的 19 岁,平均年龄 33.3 岁。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占 20.0%,民主党派成员占 2.67%,共青团员占 23.0%,群众占 54.3%。文化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89.7%,其中研究生比例为 32.0%。户籍方面,外籍人士占 1.7%,上海户籍人士占 47.3%,外地户籍人士占 51.0%。在所有调查样本中,有过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占 14.0%。从企业基本情况来看,企业性质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占 93.0%,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占比分别为 3.0%和 4.0%;行业分布以 IT 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行业,其中,IT 与互联网业占 39.3%,服务业占 17.3%,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占 9.0%。企业规模以小微企业为主,其中,企业规模最大的有 500 人,规模最小的有 2 人,从业人数 20 人以内的企

业有 179 家,占 59.7%;企业类型以自主创业型企业为主,自主创业型企业有 286 家,占 95.3%,家族式企业 14 家,占 4.7%。

二、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特征分析

人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系统。了解和把握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思想动态,需要从政治认同、价值取向、政治参与、利益诉求和社会责任等维度进行考察。总体来看,当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进步意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一)政治认同上,高度认同与消极旁观并存

由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既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党爱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价值观。数据显示,98.7%和 90.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6.7%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于西方三权分立”,95.7%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优于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展望上,约九成的受访者对“在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充满信心,并且 98.0%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在深度访谈中发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认同,但有一部分人是抱着旁观者而非主人翁的心态作出好评的。虽然“旁观者清”,但旁观者的心态容易影响政治认同的稳定性。数据显示,64.0%的受访者把“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看作企业发展与事业成功的依靠力量。针对企业家移民现象,73.3%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国的教育理念、模式和环境好。旁观者心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自认为与政权比较疏离。

(二)价值取向上,主流价值与西方思潮交互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S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非常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并对“富强”有着强烈的渴望。当问及“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应该提倡的价值是什么?”,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富强(84.3%)、平等(74.0%)、诚信(64.0%)。当问及“如果您不得不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出选择,在您看来哪个更重要?”,45.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更重要”,26.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更重要”,还有29.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为什么对“富强”情有独钟?深度访谈中,大家反映,“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了,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才有更多发展壮大机会,走出去时才有尊严,才有保障。”此外,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还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精神追求融汇于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应包括:诚信(86.3%)、守法(75.7%)、创新(69.3%)、爱国(66.7%)、敬业(63.7%)和贡献(61.0%)。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又夹杂着对西方价值观的偏好。当问及“您更倾向于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西方价值观?”时,16.7%的受访者表示更倾向于认同西方价值观,还有超过三成(33.7%)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只有一半(49.6%)的受访者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访谈中,谈到民主与富强的关系时,大部分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使富强走得更远,并更多地吧民主理解为选举民主。

(三)政治参与上,参与使命与参与动机背离

政治参与是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按照一定程序代表和反映部分群体利益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或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从政治参与和使命和动机的关系来看,逾五成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多是从企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角度来看待政治参与,把反映企业发展诉求作为参政的主要目的。在“您对企业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怎么看?”一题中,回答“能拓宽反映愿望和要求的渠

道,更好地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占77.7%,回答“提高企业和个人名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占58.7%,回答“有助于接触高层领导,建立更多人脉关系”的占50.1%,只有46.0%的受访者回答“实现政治理想,为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情”,还有40.3%的受访者认为“在商言商,企业家不宜过多地参政议政”。从政治参与意愿和现实状况的对比来看,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态度是积极的,但现实中通过制度化渠道参政议政的比例又比较低。在“如果邀请您代表您所在阶层参政议政,您愿意吗?”一题中,回答“非常愿意”的占23.7%，“比较愿意”的占46.0%，“说不清”的占17.0%，“不愿意”的只占5.3%。当问及“您目前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参加其他社会组织工作吗?”,90.7%的受访者回答“没有”,只有2.3%的受访者回答“有”,还有7.0%的受访者拒绝回答。从深度访谈情况来看,企业发展阶段不同、企业规模大小不同,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同。一般来讲,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的企业家,政治参与愿望较弱。与老一辈非公人士在自身经济地位提升后才有了较强的政治诉求不同,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政治有天然的亲近感,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问题意识。这一不同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公民政治参与不断有序拓展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虽然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国家事务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但对身边的社区事务关注度却比较低,政治冷漠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3]

(四)利益诉求上,企业发展与自我实现兼具

马斯洛提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求,并以人的最基本需求——生理需求为起点,对人的各种需求进行递进分层。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情况,我们发现,与老一代非公人士相比,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老一代企业家更多是生存驱动的“被动创业者”,那么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更多是机会驱动的“主动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变化,使得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核心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希望

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能够与赚钱结合起来,他们不仅关注企业发展,而且关注自我实现;不仅关注财务回报,而且关注财务回报实现的条件和过程。深度访谈中,当问及“您为何创业?”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提到了“理想”“自我实现”“兴趣”等。数据显示,4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当前处于“自我实现的需求”。18.7%和 17.7%的受访者分别认为自己处于“尊重的需求”与“情感和归属的需求”。需求层次的不同也决定了思想引导方式方法的不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您最为关注的事项有哪些?”一题中,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企业的健康发展”(74.3%)、“产权保护制度”(66.3%)、“全家身体健康”(47.7%)。因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创办企业时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因此他们更加注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社会认可,对政府环境的要求较高。在影响核心利益实现的外部环境方面,受访者认为主要因素有:政策不稳定、法治不健全、成本居高不下等。他们非常关注全面依法治国,79.7%的受访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较大影响,只有 4.3%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还有 16.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72.7%的受访者认为,建立“亲”“清”新兴政商关系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规避政策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以及政府环境的影响,约五成的受访者愿意选择从事“竞争性行业”,还有 29.0%的受访者愿意选择从事“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性业务”,只有 24.7%的受访者愿意从事“垄断性行业”。

(五)社会责任上,主观认知与实际行动不符

上海市 S 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对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认识与党和国家对企业家的要求基本吻合。数据显示,当问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时,81.3%的受访者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义务”,76.7%的受访者认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8.7%的受访者认为“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影响企业发展”。虽然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一般的慈善捐助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对

将财富全部捐献的裸捐却非常不认可。关于对“裸捐”行为的看法,53.3%的受访者认为“可以讨论但不宜提倡”,19.7%和 16.3%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个别企业家的作秀和一种舆论炒作”,还有 10.7%的受访者认为“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当问及“您对炫富行为的看法”时,18.6%的受访者认为“可以理解”,57.1%的受访者认为“太高调”,24.4%的受访者认为“无所谓”。在实际行动上,上海市 S 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基本能够做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开展捐资助学、结对共建、扶贫济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兴办公益事业等活动。但在深度访谈中,当问及企业是否参加过公益慈善方面的活动时,绝大部分表示参加过,但经常参与的则比较少。此外,上海市 S 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光彩事业等专项活动的了解和投入还不够。这说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思想认识上能够摆正国家、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要将这种认识外化为自觉、主动的行为还有一个过程。从制约认识转化为行为的因素来看,受访者普遍提及的是慈善文化和慈善制度。

三、研判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

在调查问卷分析和深度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户籍、留学、宗教信仰等因素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有明显的相关性,故通过交叉数据专门分析了无上海户籍、有海外学习工作和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思想动态。

(一)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政治认同、城市认同相对偏低

受访者中,上海户籍人士占 46.3%,非上海户籍人士占 53.7%。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除了发挥其本位职能外,还承担着政治、社会、经济等其它功能。本次调查发现,户籍不同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当前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也不同。

第一,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认同相对偏低,对未来发展比较迷茫、信心不足。当问及“您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这一

问题时,68.4%和28.1%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充满信心”和“信心一般”,而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同一观点的则分别为59.0%和19.9%;3.6%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而回答“说不清”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占17.3%。在“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题中,73.4%和25.2%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十分认同”和“比较认同”,而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此观点的则分别为55.8%和27.6%;0.7%的上海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而回答“说不清”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占14.7%。对“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问题,非上海户籍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也有较高比例回答“说不清”,反映了其迷茫的心境。

第二,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上海的城市认同有待提高。不管是上海户籍还是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均认为地方政府对其企业发展和日常生活有较大影响,但上海对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向心力较弱。在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看来,认为地方政府对其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和“较大影响”的分别占16.7%和69.9%,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相同观点的比例为32.4%和48.9%。关于在上海发展的决心,78.4%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选择“坚决在上海发展”,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此观点的只有39.7%,42.3%和10.9%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选择“看情况”和“会离开上海到别的地方发展”。

第三,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愿意参政议政。当问及“如果邀请您代表您所在的阶层参政议政,您愿意吗?”时,26.9%和47.4%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而持同一观点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比例为20.1%和44.6%;12.2%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而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的比例为23.0%。与参政议政的高意愿相比,现实中,不管是上海户籍

还是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比例都较低。在“您目前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其他社会组织工作吗?”一题中,2.9%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1.3%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是”。但10.3%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拒答”本题,而“拒答”本题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为3.6%。深度访谈中,部分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政治参与是改变其企业和个人境遇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注重安全感、更倾向西方价值观

本次调查样本中,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占14.3%,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占85.7%。不管是否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受访者对自身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认知差异并不大。在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中,均有将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处于中等层次(分别是44.2%和45.8%),逾二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处于较高和很高层次(分别是20.9%和23.4%)。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受访者中,中共党员占25.6%,民主党派成员占11.6%,共青团员占23.3%,群众占39.5%;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受访者中,中共党员占18.5%,民主党派成员占1.2%,共青团员占23.5%,群众占56.5%,0.3%空缺。虽然受访者对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的认知相似,且有海外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群众比例较低,但由于学习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需求层次上更注重安全感。在“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您觉得您目前处于哪种需求层次?”一题中,30.2%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自己处于“安全上的需求”,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只有15.0%认为自己处于“安全上的需求”。此外,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还比较注重

“自我实现的需求”(39.5%)与“尊重的需求”(27.9%),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还比较注重“自我实现的需求”(48.8%)与“情感和归属的需求”(22.7%)。

第二,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价值观上更倾向西方价值观。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整体上都高度认可党的领导和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但与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相比,其坚定性偏低,更倾向西方价值观。当问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上,您觉得自己更倾向于认同哪种价值观?”时,37.2%的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倾向于认同西方价值观”,而持同样观点的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比例为23.1%。关于政治制度,分别有66.5%和67.7%的无海外背景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十分认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于西方三权分立和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优于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持同一观点的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有48.8%和55.8%。

第三,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相对较低。在“如果您不得不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出选择”一题中,37.2%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民主更重要”,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民主更重要”的则占23.1%。虽然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民主很重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冷漠,当问及“如果邀请您代表您所在阶层参政议政,您愿意吗?”,“非常愿意”的比例明显低于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不太愿意”和“不愿意”的比例明显高于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深度访谈中,当问及如何看待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时,不管是否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都较为普遍地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言:“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

(三)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普遍对宗教持宽容态

度,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

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占15.3%,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占75.3%,而拒答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比例为9.3%。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来看,大多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都能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有限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国外势力的支配,并积极响应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有关宗教的精神。^[5]但通过对比分析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我们发现,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普遍对宗教持宽容态度,但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在看到宗教积极作用的同时容易忽视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一,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在“您是否关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一题中,47.8%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十分关注,全面了解会议精神和内容”,而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只有3.5%回答“十分关注,全面了解会议精神和内容”。还有32.6%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比较关注,了解部分会议精神和内容”。当问及“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是否正确”时,只有10.9%有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正确,而持同一观点的无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为39.8%。当问及“您对有人信仰五大教之外的新兴宗教如何看待”时,47.8%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信什么教都行”,而无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只有26.1%持同一观点。

第二,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容易忽视宗教的消极作用。关于宗教的积极作用,82.6%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57.5%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宗教有心理

慰藉、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群体凝聚等功能”“能使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但关于宗教的消极作用,89.1%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不能正确认识宗教的消极作用,看不到“宗教也有可能成为分离族群、愚化民智、妨碍革新的消极力量”,甚至17.4%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宗教能消灾免祸,保平安”。在深度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个别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有迷信思想。

第三,有无宗教信仰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自我认知的影响。数据显示,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差异并不大。60.9%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63.3%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十分认同”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1.7%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74.3%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十分认同”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梦。但是,有无宗教信仰的差异会影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自我认知。当问及“您认为今天取得的成就主要源于什么?”时,被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列为前三的因素分别为: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78.3%),靠自己良好的人脉资源(60.9%)和靠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56.5%);被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列为前三的因素则分别为:靠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66.8%),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61.1%)和靠对市场的敏锐认知(53.1%)。

四、加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引领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思想防线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做好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教育引导,以思想引领筑牢政治认同,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时代课题。

(一)建立工作机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长期化、制度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

深刻变化。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来看,呈现出显著的多变性、多元性和多层性等特征。思想引领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不是一次调研一次访谈所能解决的。我们建议建立一套能够及时、长期跟踪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的研判与响应机制。所谓研判,即研究判断,是根据事物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和状态,探求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性,并借此预先判断事物未来发展和状态的一种科学认识活动。响应是指响应主体对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并根据事件的特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控制事态向正常状态转化。^⑨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机制是指在认识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规律性的基础上,揭示其发展方向和趋势,并行之有效地应对与引领的机制。第一,制定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战略。战略中主要包含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建设的核心要素,思想动态管理计划,思想危机处理预案,思想建设状况评判等,并将思想动态研判工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第二,成立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小组。目前,没有专门机构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进行引领,宣传文化部门、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工商和劳动部门等分别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其进行指导、管理、服务和监督。多头管理的弊端在于缺乏协同性,容易造成遇事互相推诿。要准确把握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在组织保障上需要专门建立由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小组,并将其作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引领的核心机构。第三,给予充分的资源保障。一是信息资源。真实客观的信息是进行思想研判与响应的基本前提。在能够多渠道真实有效地收集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筛选、分类与归因等处理。二是物质资源。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小组不一定是专门的实体机构,但它必须有开展工作所必须的物质保障,有一定财务预算和设备条件。此外还需要人力资源等。

(二)关注企业家需求,政治引导寓于助推企业发展、自我实现之中

非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取向,决定了企业家

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思想和行为模式。在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众多利益诉求中,企业发展是其核心利益。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因此,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引导,首先应立足于企业发展和自我实现,关注其新常态下的实际需求,把组织优势与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经济优势,鼓励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将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在共同奋斗中政治引导,在被引导中熟悉和掌握引导身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方式方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单纯以施惠政策或政治安排等措施争取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与信任,结果投资者变成投机者,政治安排变成政治保护。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服务凝聚是政治引导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切入点,价值凝聚才是落脚点,后者比前者更能够激发“忠诚与团结”的社会资本。调研发现,大多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多是将企业发展、财产安全、自我实现等要素作为认同与信任的重要变量。因此,我们建议关注企业家困难,寓政治引导于助推企业发展和企业家自我实现之中。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您最希望工商联做什么?”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提供政策信息服务,搭建沟通平台(72.3%);加强行业指导与服务(64.7%);协调企业与党政部门的联系(56.7%)。在处理好组织与自律、规范与自主、服务与引导三重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重发现、助发展、促履职”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成长机制。

(三)优化教育培训,分层分级分类开展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按照中央要求,上海市S区以助推非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为主线,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为主要内容,着力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开展“四信”教育,引导他们积极投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增强教育有效性和针对性的前提是教育对象的分层分级分类。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培训需求,确定教育目标,调整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构

建科学教育培训体系。由于企业发展、年龄阶段、教育背景、工作环境、个人理想等不同,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教育着重点也应不同。

第一,针对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增加其对上海的认同。当问及“您认为自己融入上海的程度是怎样的?”只有23.7%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自己“完全融入”,约六成认为自己只是“有所融入”,1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融入”,还有3.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深度访谈中,绝大部分非上海户籍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反映,因为户籍的不同,导致在购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存在差别待遇。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上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城市认同度的高低还会影响其对整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度。因此我们建议,做好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引领,亟需从权利公平角度探讨非户籍人口获得公共服务的制度问题,适当剥离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

第二,针对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增进其对国情的认识。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也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科学认识我国国情,不仅要认清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要认识我国的文化传统、历史使命等。深度访谈中,个别有海外留学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认为西方月亮更圆的同时,还不十分清楚中国的月亮是什么形状。思想引领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需要更多地让其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及决定这条道路的国情。

第三,针对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增强其对宗教的认识。从法律法规来看,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信教并参与宗教活动是合法的。但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对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特别是那些只看到宗教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甚至误解我国宗教政策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要广泛深

入地开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宣传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要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消除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参与宗教活动的消极影响,防范非法宗教的传播渗透。

(四)加强非公党建,创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第一,融入大党建,形成党建与统战协同运作机制。随着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党组织在非公企业特别是在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中的覆盖率日益提高。个别非公企业,还成立了党委统战部。基本上党组织建到哪里,统战工作就可以开展到哪里。将统战工作主动融入“大党建”格局,“以党建带统战,以统战促发展”是我们熟悉的统战工作方式。但整体来看,非公企业的党建和统战工作之间还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协同运作机制。制约二者协同运作的主要障碍是个别领导干部不能摆正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的关系。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两大法宝,二者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正确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促进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

第二,适应新形势,探索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统战工作模式。因为此次调研中小微企业占绝大部分,个别企业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数据显示,参加此次调研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为20%,企业已经建立独立党组织的比例为5.7%,由于本次调查样本中小微企业居多,大部分不具备建立独立党组织的条件,故建立独立党组织的比例偏低。逾六成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打算。可以说,小微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低不仅是当前的现状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走势,这迫切需要我们探索无党建依托下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第三,把握规律性,构建新媒体统战模式。在新媒体成为人们生活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大趋势下,不管有无党建依托,运用新媒体开展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建设都是“互联网+”时代赋予统战工作的重要使命。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迈尔这样评价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他说:新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8]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利用新媒体情况来看,他们有极大的热情和足够的能力驾驭这些新媒体,并习惯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表达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新媒体是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喜闻乐见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运用新媒体开展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建设,一方面,将新媒体看作一种技术工具开展线下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将新媒体视为统一战线的新领域开展线上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统战工作。通过线下人与线上人并重的双向互动,建立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网络政治价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人民日报,2015-05-21(1).
- [2] 辜胜阻.只有企业家阶层壮大才会有国家的崛起[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20071130/00174233378.shtml>, 2007-11-30.
- [3] 王俊华.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动态与统战工作[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4):5-8.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6.
- [5] 娄钰华,杜坤林.大学生思想动态研判机制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0(10):92-9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 [7] 刘延东.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J].求是,2001(13):24-25.
- [8] 王俊华,蒋连华,许家鹏.上海新的社会阶层功能作用发挥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5):46-51.

编辑:龚万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的探讨与建构

韩 阳

摘 要:政商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一组重要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亲与清”成为建构新型政商关系的价值导向与现实要求。进一步破除阻碍政商关系健康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政商治理所需要着力克服的关键难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社会价值的多元扩散,政商之间的利益统合以及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等,都在为我国新型政商关系的健康发展不断积累正能量。

关键词:新时代;现代化;政商关系;亲与清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8)01-00064-06

政商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在世界各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能否处理好政商关系成为考验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自变量。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如何真正厘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破解发展难题的哥德巴赫猜想”^[1]。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从理论上对政商关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商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赋予了时代内涵,提供了科学指导。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的四个维度

“一个国家的政商关系如何,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3]。正确认识新时代政商关系的理论内涵,不仅是建构新型政商关系健康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透视和评价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

(一)价值维度:“亲与清”

在世界各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政商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总体上,政商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波浪式互动,即当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发展时,往往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导致经济疲软与政治腐败;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常常招致严重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商之间

收稿日期:2017-12-03

作者简介:韩阳,男,河南开封人,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这种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一般被用“强弱”或“大小”来形容。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不仅也不能是这样存在”^[4]。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强弱”和“大小”的概念既不能为重新理解政商关系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更不会成为促进新型政商关系健康成长的解释性框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价值层面为重新认识政商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亲与清”意味着,政商双方在关系导向上一方面要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同时也要维系适当的行为边界,避免关系混乱、勾肩搭背。实际上,“亲与清”试图构建一种“互补共生”的良性互动来重塑政商之间的关系生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正态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亲与清”的概念虽然是第一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当中,但实际上它早已被提出。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时就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5]。此后,习近平又多次对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讲过“亲”和“清”。“亲与清”出现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既体现了顶层设计层面对于政商关系的内涵界定和指导要求,也反映了党的理论发展创新的一般规律。

(二)主体维度:党和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

谈到政商关系,如何界定政商的双方主体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核心问题。一般意义上,政商关系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观层面的“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微观层面的“官员与商人的关系”。政商关系之所以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对于政商主体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概念误区和理论混淆。此外,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政治与经济的高度同构性,导致社会转型阶段政府过多“嵌入”市场,国营企业的大量存在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至于政商关系的博弈格局更加复杂。

就政商关系的主体而言,政府无疑在这对二元关系中承担着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20]。也就是说,党和政府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商关系的主体一方。在明确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之后,十九大报告直接要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主要关涉对象。也就是说,“党和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了政商关系的二元主体,新型政商关系主要指的是“党和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间的关系。这种主体的界定也意味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最终目标虽然是进一步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现实关切则主要落脚于中微观层面的党和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间的关系。

(三)结构维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统一战线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政商关系的论述主要出现于第六部分“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中,具体见于第六节“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当中。在逻辑顺序上,“政商关系”排列在民主党派、民族政策、宗教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之后,海外侨胞与归国侨眷之前。政商关系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出场位置和排列顺序说明,在顶层设计层面,政商关系在性质上主要被当作一项政治问题来看待,而不是经济问题。与之相比,“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论述主要出现于报告的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更为明显的经济问题色彩。由此可见,政商关系主要被置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野当中,按照统战工作的解释框架来认识和讨论的。

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当中,“政商关系”能否健康发展被视为影响人民当家作主和政治秩序的变量因素。在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与经济的高度同构性,政商关系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入结构误区。这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导致的经济停滞,更突出的影响则是由于对资本的政治扩张缺乏有效控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结构的撕裂。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党和政府才从民主政治与统

一战线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政商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在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统一战线机制调控市场与社会的发育方向,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成功应对新的经济主体的出现给政治上层建筑带来的巨大挑战。

(四)技术维度: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

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中,政商关系主要被界定为政治问题,即如何通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根据这一逻辑,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必然需要配套相应的政治途径和政治安排。在统一战线的领域中,“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是执政党衔接政治系统与经济领域、处理政商关系的两大作用机制”^[6]。其中,组织嵌入主要是执政党领导的各类党团和社会组织嵌入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生活当中,如非公党建等;政治吸纳包括组织吸纳、体制吸纳、意识形态吸纳等方式,即通过政协、民主党派、理论宣传等渠道进行。

进入新时代,组织与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技巧也需要升级和迭代。在组织嵌入上,统一战线不仅要进一步扩大党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覆盖程度,更要着力开展于“两新”组织嵌入工作,全面提升统战的共振效应;在政治吸纳上,统战工作的重点应聚焦于吸纳机制的完善精准与对吸纳成果的深度整合上。此外,与组织吸纳和体制吸纳相比,“意识形态领域的包容和尊重也已成为健康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7]。通过潜移默化的价值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吸纳能够弥补体制机制吸纳的漏洞和不足,更大程度地凝聚非公经济人士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更具解释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更新观念传播与建构的形式与方法,将会为新型政商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二、“亲与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康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在理想状态中,良性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密切

互动,但又各自行为独立,边界清晰”^[8]。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因素又在不断给政商关系的互动添加新的变量,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健康成长。

(一)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对的历史难题

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商关系不同,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从它的社会结构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当他们的商业力量成长起来之后,自然会制约政治力量,使二者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因素最开始是作为一种外来势力,甚至是敌对势力出现的。这个时候想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进行全国动员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仅是市场形成的主导力量,更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参与者和行为主体,政府参与市场经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9]。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权力也得到了加强,政商之间呈现高度的依赖性,以至于政商关系总是趋于僵化和畸变,败坏的政商关系反过来会限制经济的成长以及政治的进步。

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言,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权力与资本的交错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政商发展路径,与其说是政商之间的合作,毋宁说是政商之间的共谋。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运行惯性对现阶段社会转型和政商治理依然留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于政府过多“嵌入”市场,造成了政商之间缺乏必要的边界划分和制度规范。可以说,“近现代政商的发展逻辑表明,传统的政商发展路径对当今政商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由此可见,如何清除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历史包袱,营造适合政商发展的制度和人文环境,是新时代健康政商关系需要着重治理的难题。

(二)利益诉求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张力

“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连续不断的过程。”^[11]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会促使各种社会力量的

集聚化和多样化。所有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国家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各种社会力量会纷纷崛起并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们交往的日益密切,商人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或计划经济式的社会系统当中释放出来,作为一股活跃的力量活动在社会协作体系当中。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中,部分商业精英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经济利益,提升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经常会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如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加入民主党派、支持非公党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进入政府领导或部门的视野,等等。

面对非公经济人士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既有的政治制度能否提供足够的弹性空间予以应对,有可能深刻地影响到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政府如果顺势调整自己的制度框架,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将新兴的社会阶层吸纳进来,使商人的利益诉求与政治稳定之间保持一种持续性的动态平衡,那么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得到延续和再生产。很多的相反的情况也表明,“如果现有的规则不足以容纳这些利益诉求,那么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将会颠覆、排空、置换现有的规则秩序,混乱无序和野蛮竞争将会成为常态”^[12]。由此可见,利益诉求与政治稳定之间构成了一股内在张力,促使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制度安排妥善吸纳新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

(三) 社会价值观念的分立与摩擦

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领域的所有变革。从心理层面看,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尤其对于政商之间这种涉及各种利益分配的关系格局,由价值观念转变带来的摩擦和冲突就更为明显。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政商关系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判断,甚至同一群体内部对政商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对于政府而言,部分观点认为和商人的关系可以作为善加利用的资源,部分观点却将商人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对于商人而

言,有些观点认为和官员搞好关系能够获得额外的帮助,有些观点认为和官员最好保持适度的距离;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当前的政商关系太过紧密,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在国家主义者来看现在的政商关系过于松散,限制了政府的能力。

需要申明的是,在社会由价值一元向价值多元变迁的过程中,对同一个问题存在多种看法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令人担心的只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分立与摩擦是否会影响到甚至阻碍政商关系的健康发展。部分事实也证明,这种担忧也并非没有可能。党和政府能否对政商关系统一认识,影响着政治秩序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有序;非公经济人士对和政府关系的理解与讨论,影响着他们在现实选择中的资产配置和发展计划。此外,社会公众对政商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共享心理”也往往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以及政府治理合法性的积累。可以说,如果社会各界能够对政商关系达成共识性理解,将会为新时代政商关系的健康发展增添更多的确定性因素。

三、“亲与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建构逻辑

对政商关系的评价要坚持历史的、具体的眼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商关系虽然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基本都属于现代化过程中在所难免的共性问题。所幸的是,既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相应的弹性空间,“协调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确保政局和社会稳定”^[13]。更重要的是,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一些新的制度或资源的出现,也在为新型政商关系的健康成长酝酿新的基因。

(一) 法治建设提供平等互动的制度框架

身份平等是构建“亲与清”的政商关系的逻辑起点。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14]。人类为了解决平等问题有过许多尝试,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法治。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为政商之间平等身份的确立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

的支持。法治的基本精神体现于一律平等和一视同仁。一律平等意味着法律平等地适用于制定规则的人和适用规则的人,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任何主体没有权利被赋予例外;一视同仁意味着法律不针对特定的人或事,而是对所在时空下特定情况的抽象规定。

法律除了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它还应该是公知的、确定的、平等的和正义的。在法治框架下,政府和企业都拥有一个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空间,并根据确定的法律预见有可能产生的行动后果。良善的法律离不开严明的执行。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执法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需要得到社会的共识,而非由政府任意解读。另一方面要避免对待同类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因为这样就违背了法治的一般性行为规则。当然,“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实现仅仅靠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准是不够,政府部门对于企业采取的强制性行动同样也要受制于司法审查。值得期待的是,“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新型政商关系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下去”^[15]。

(二) 社会多元价值的成长与扩散

在当下中国社会,政商关系的健康生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个历史契机,即由现代化进程所孕育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经过上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统摄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价值,以至于“读书做官”成为统合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得政治资本的人能够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方面实现赢者通吃。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化进程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状态向领域分离状态的转变”^[16]。相应的,价值领域也发生了从一元向多元的转换。根据以赛亚·柏林的观点,“现代社会中人类追求的价值或目标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许多价值或目标之间常常不能兼容甚至存在冲突,价值之间是不可公度因而也不可比较”^[17]。

借助价值多元论的思想资源,新时代的政商关系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景象。首先,价值由一元

向多元的转变,可以让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去追求最适合自己或更为偏好的价值,如喜欢公共事务的人可以去从政,热衷经济利益的人可以去经商,注重主持正义的人可以去当法官或做律师。由于价值是多元的,不同的人都可以在价值体系当中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无需承担选择上纠结或困惑。其次,由于价值之间是不可通约、难以比较甚至相互冲突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只能选取一种价值,而不能赢者通吃。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既想当官又想赚钱,如果他想换一种价值体验,就必须摒弃前一种价值。由此推论,由领域分离引发的价值多元有助于从价值层面上进一步厘清政商之间的关系界限。

(三) 政商之间利益的整合与统一

在获得一定经济基础之后,非公经济人士往往会产生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构成这种愿望的动机是多元的:首先,作为政治动物,人本身就具有参与公共事务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其次,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议程,争取企业发展的政策红利;再次,希望通过获取政治身份从而维护和保障企业的正当权利,等等。作为社会协作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商人的利益诉求必然要通过公共场域表达,即进入政治的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安排对商业精英进行了组织吸纳、体制吸纳、意识形态吸纳,如开放非公经济人士入党,安排他们进入人大、政协等,不仅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还把尚未成熟的社会力量转换为了扶持与合作的伙伴,从而“民商的经济思维和政治逻辑一致起来”^[18]。

“政商关系要解决的是政府官员这个群体和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能给政府官员有足够利益的话,他肯定是会去腐败。”^[19]也就是说,健康的政商关系不仅需要保障商人的正当权利,而且要重视公务人员的正当利益。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都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果商业精英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而政治精英却在官僚制的桎梏中止足不前,那么现实压力一定会倒逼官员利用手里的

权力撬开制度漏洞,这就必然会导致政商关系的败坏。所以,为政治精英提供应有的福利待遇,保障其工作的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单靠经济激励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荣誉地位的权威性分配,进一步鼓励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四)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推动新时代政商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纵观中国政商关系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的规律性认识:在政府主导和强干预的模式下,政商关系倾向于异化和畸变的;在政府适度干预和服务导向的模式下,政商关系就呈现出健康而有活力的一面。只要政府权力可以不受制约地对经济生活施加控制性影响,那么政商关系就存在异化变质的可能。实际上,政府主导诱发的政商关系异化也并非中国的孤例,大多数拥有强政府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为了构建新时代“亲”与“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政府需要为经济发展营造更为自由宽松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简政放权意味着进一步下放或取消部分政府行政审批权力,提高必要的行政审批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此外,通过制定和公布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使企业和公民可以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渠道监督政府的权力运行。这样,不仅使“亲”保持合理尺度,也让“清”得到实质保证,有助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余金成.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哥德巴赫猜想[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俞可平. 中国政商关系的特殊景象[N]. 北京日报,2015-11-30(20).
- [4] 邱实、赵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商关系的演变和发展[J]. 人民论坛,2015(2):15.
- [5] 人民网:习近平提“亲”“清”二字的历史渊源[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13/c40531-28195149.html>,2017-12-28.
- [6] 张艳娥. 统一战线处理政商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转型创新[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43.
- [7] 韩阳. 健康政商关系的基本内涵、实践经验与建构路径[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52.
- [8] 杨典.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2):31.
- [9] 马良灿. 从自发性到嵌入性——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战与反思[J]. 社会科学研究,2013(3):98.
- [10] 张学娟、郝宇青. 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J]. 理论探索,2017(1):78.
- [11] [美]布萊克. 现代化的动力[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22.
- [12] 韩阳、宋雅晴. 非公经济人士对健康政商关系的影响及其治理[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5):45.
- [13] 薛澜. 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J]. 公共管理学报,2014(4):2.
- [14]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
- [15] 邵景均.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J]. 中国行政管理,2016(4):1.
- [16] 王南湜.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53.
- [17] 马德普、刘训练.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7.
- [18] 张伟. 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88.
- [19] 郑永年谈政商关系:不能给政府官员足够利益肯定腐败 [EB/OL], <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50326/3848819.shtml>,2017-12-28.

编辑:龚万达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的综合素养

朱虹

摘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统一战线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各级党政干部了解统一战线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平台,反映和传播统一战线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作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对学报的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必须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综合素养包括政治素养、专业素养、文化素养和编辑技能等方面。坚定的政治定力与敏锐的政治把握力,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应具备的首要的政治素养;统一战线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能力,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坚定的文化自信,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需要具备的文化素养;同时,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也必须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编辑所具有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综合素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8)01-0007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社会主义学院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因而肩负着三大重要任务,即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宣传阵地、统一战线成员思想碰撞的平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也相应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统一战线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各级

党政干部了解统一战线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平台,反映和传播统一战线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出版物复制、出版、发行工作的前提和龙头。新时代下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学院学报需要有高质量、高素养的编辑。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作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生产的重要参与者,需要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养,努力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办好、办精。

一、坚定的政治定力与敏锐的政治把握力,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应具备的首要政治素养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与一般的社会科学刊物的

收稿日期:2018-01-05

作者简介:朱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编辑。

最大区别在于其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性,这种浓厚的政治性,对编辑的政治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宣传性、统战性色彩。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对其刊载的文章有特殊而严格的要求,因而对其编辑也提出了特殊而严格的要求,即坚定的政治定力与敏锐的政治把握力。

一般的社会科学刊物的编辑,也需要讲求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大方向上不能存在差错。学术期刊刊载的内容,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作为政治性学院的官方刊物,则不仅仅需要在大方向上不出现偏差,而且是有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要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职能,有着明确的宣传边界。正确认识学术研究无禁区与理论宣传有纪律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分清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界限,也有利于理论宣传部门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核心任务是要充分发挥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统一战线成员前沿动态等方面的宣传作用。在当前,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体现时代性特点;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做好统一战线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的宣传工作。在宣传中,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定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把握能力,有着明确的宣传边界意识,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深入宣传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和最新实践。

二、统一战线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能力,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

“学术期刊的工作对象就是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从组稿、来稿登记、审稿到编辑排版,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围绕着学术成果。了解专业领域的学术动态与最新发展,阅读最前沿、有代表性的作品,把握专业的发展方向,是编辑日常需要思考

的。”^[1]一个合格的学术期刊编辑,不只是简单地处理文字,而且是应该能够清楚识别学术成果的质量及其价值。学术期刊的编辑不是文字校对员,而是优秀文章的发现者、改造者,必须具有对文章优劣的辨别力,去粗取精,存优去劣。一个优秀的学术期刊编辑,一方面,他可以在当前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对作者提出进一步优化的意见建议,使得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独自承担该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编辑只有有所专长,才能在评价取舍上赢得作者信任,进行对话和交流。不学习、不研究该领域基础理论的话,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编辑,更无优秀可言了。如果说,各个领域期刊的编辑都要努力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这是普遍性;那么,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要成为统一战线领域的专家,这是特殊性。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编辑只有认真学习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努力成为统一战线领域的专家,才能够胜任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编辑工作。必须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工作有充分的研究,既要深入学习统一战线的基础理论,也要时刻关注统一战线领域的最新动态。在当前,要关注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进展、多党合作的新变化、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问题、宗教的中国化问题、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问题、新阶层人士问题、两岸关系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把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结合起来。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两种理论能力。

一是对统一战线领域相关概念的清晰认知力。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统一战线理论的宣传阵地,学报编辑如果对于相关概念不够清晰,必然无法发现和纠正文章中出现的概念性错误和理论错误,造成错误宣传。由于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官方刊物,在读者心目中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这种错误概念、错误理论一旦出现,会造成一大批读者的理论误解,将错误的概念理论当成正确的来使用而使得概念误传。对于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对于核心概念有清晰明确认知的学者来说,在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中发现这种基础性错误,会令其产生对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权威性的怀疑。对核心概念的把握必须清楚、明确,不能有一点偏差,对于别人的文章不能简单的全盘认可,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文章,必须加以指正。

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为例加以分析,概念的理解偏差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概念的内涵理解不清。如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至少包括政党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等几个层面”。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是指各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监督”^[2]。相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具有权力性或法律性而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一种非权力性的柔性监督,不包含权力监督层面内容。二是对概念外延理解不清。如有学者将民主党派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电视问政、行风评议等内容纳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这种观点其实是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误读,误将民主党派成员所开展的监督都当作民主监督。实际上,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主要是指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一种政党监督,也是一种政治监督,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政党组织性。三是概念使用具有随意性、不严谨。如有人在文章中使用“党派监督”这一词汇,但是在目前的任何官方文件中,从未出现过这一概念,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不能替换成党派监督。上述问题,编辑在审稿过程中如果能及时甄别并与作者充分交流,就可以及时纠偏补漏,从而保证最终学术成果呈现的逻辑严密性和科学性。作为文字的校对者、错漏的修补者和文章质量的把关者,学术期刊编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决定着期刊的质量、层次和读者认可度。

二是善于把握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事件,及时开发选题、引领学术前沿的能力。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统一战线领域宣传的前沿阵地。宣传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不能守株待兔,等待学者和研究人员来投稿。宣传性刊物的编辑必须发挥主动

性,就本领域的重要热点问题和重要事件,开发选题,广泛征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必须时刻关注统战领域的新形势新动态,主动进行专题设计。同时,必须关注国家大方略和大布局,将统一战线工作和理论与大方略大布局结合起来,开发新课题,寻找新思路,引导新的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统一战线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其体系框架、时代特征等系列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又如,正值民主党派中央换届,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可以就民主党派政治交接进行选题的开发,就民主党派换届的经验总结、民主党派优良传统的继承、新时代对民主党派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新要求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坚定的文化自信,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需要具备的文化素养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不但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宣传媒介,还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平台。因此,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不但需要具备专业的统一战线方面的知识,还必须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是维系海内外同胞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好港澳台海外同胞统一战线工作,离不开中华文化;增进少数民族的认同,也离不开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科学把握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个广义的范畴,是包含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文化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时代文化的统一体。现在谈论中华文化,多数人会联想到中华文化,这是不全面的。

提高对相关文化的把握力,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对各种文化有广泛的涉猎。文化是广

义的文化,必须对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有所涉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提高文化把握力,也需要有这样宽广的视角,到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找寻素材,汲取营养。既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遗产,也要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既要从过去汲取营养,也要立足于当代,为正在做的事情服务。

提高对相关文化的把握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宣传者,学习大量的文化知识,汲取大量的文化因素,归根到底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宣传统一战线服务。因此,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思想核心,不能在繁杂的文化知识海洋中迷失自我。

四、编辑知识的掌握与编辑技术的熟练运用,是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是也遵循着一般编辑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只强调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作为一名学术编辑的基本素养,体现不出其特殊性;只强调其特殊素养,忽视其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基本素养,则违背了普遍性规律。因此,论述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的素养,既要分析其作为一个政治性极强的宣传学报编辑的特殊素养,也要指出其作为学术期刊编辑的一般素养。

编辑工作有其专业性的一面,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基本专业素养,包括编辑出版基本理论、新闻出版传播专业知识、编校工作实践技巧、文字处理基本规范等方面,“不仅对(编辑)专业方面的知识要广、要深,而且对有关政策法规、学术动态、

发展水平,以及编排、策划、印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新知识也应丰富”^[3]。

“学术期刊编辑要熟悉期刊策划、组稿、审稿、编辑、校对、营销等一系列流程。”^[3]必须在这一系列流程中,充分发挥编辑的主动创新意识,体现编辑的专业知识、技巧和方法,保证编辑作品的科学性、严谨性。学术期刊编辑,必须熟悉文字的编校、版面的设计、格式的规范等基本的编辑工作。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新媒体日渐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事新媒体编辑传播的人员固然需要掌握多种适应网络时代的编辑方式,传统纸媒的编辑也需要与时俱进,努力学习新媒体技术,将编辑工作和新技术结合起来,创新编辑方式,提高自身的信息把握和分析能力。^[4]

保持和作者的沟通力。编辑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是使文章这个红花更为美丽的绿叶。编辑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将更好的文章呈现给读者,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编辑必须保持和作者的沟通力。保持沟通力,并不是简单地指编辑能够及时联系上作者,保持与作者的通信联系,而是与作者能进行专业层次上的深入交流,包括关于来稿选题和文稿具体内容修改的沟通能力。

参考文献:

- [1] 王晚霞.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理想与期刊质量[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00-106.
- [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 [3] 高清.理论期刊的质量与编辑素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70-172.
- [4] 刘艳萍.学术期刊编辑应具备的素养及提升路径[J].黑河学院学报,2016(04):126-128.

编辑:王芳

干部培训在增强文化自信中的作用调查及分析

侯 丹

摘 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各级干部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大干部是否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关系全社会的文化自信程度。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等作为各级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不断加强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工作,对于坚定干部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信;干部教育培训;社会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8)01-00074-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系列论述,明确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各级干部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级干部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担当。为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在增强干部文化自信中的作用,掌握对文化自信方面教学需求,探索有效途径开展精准化培训,近期,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市委党校等单位对参加教育培训的学员开展了“干部培训在增强文

化自信中的作用和有效途径”专题问卷调查。

一、对文化自信的认知和态度

(一)受访对象基本情况。此次问卷调查既注重对象的广泛性又强调针对性,同时兼顾职业代表性。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有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及部分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年龄分布为,35岁以下104人,占比例44%;36-45岁61人,占比例26%;46-55岁63人,占比例27%;55岁以上7人,占比例3%。在文化程度方面,64人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例27%;161人为大学本科学历,占比例69%;10人为大专及高中学历,占比例4%。对这些来自不同行业且教育背景相异的对象开展问卷调查,能较为全面反映出干部队伍对文化自信的认知状况。

(二)对文化自信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分化。通

收稿日期:2017-12-05

作者简介:侯丹,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主任科员。

过问卷调查发现,认为当前干部队伍对增强文化自信非常重视的占30%,认为重视程度一般的占48%,认为重视程度不够的占22%。认为重视程度一般或不够的两项合计占70%,数据表明大多数受访干部对在干部队伍中增强文化自信工作的满意度不高,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相关工作仍有改进的空间。同时,从受访干部个人的角度看,对中华文化,82%的受访者表示具有强烈的自信,十分认同和喜欢。18%的受访者则选择了自信心和认同感一般。这一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受访干部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对其具有较强的精神归属感和文化自觉自信。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对中华文化普遍而强烈的感情,也使得他们对相关教育培训工作具有强烈的期待和较高的评价标准。

(三)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认知有待加强。在回答“当前干部队伍应重点加强哪些方面的文化自信”时,212人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56人选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39人选择“革命文化”。这一方面反映出广大干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同时,也说明一些干部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够全面系统,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重要地位的认识有待加强。此外,还有受访干部建议加强“地方特色文化”及“前沿科技文化”学习,这些有益建议应成为社会主义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部门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优秀文化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在问及“对文化自信与干部强基固本修身正德关系的认识”时,71%的受访干部认为文化自信“是根基,非常重要”,18%的人认为“有作用,但非决定因素”。此外,还有11%的受访干部认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所忽视”。调查结果一定程度反映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干部对“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一重要论断的认识有待提高。

(四)对强化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具有理性认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强化文化担当,首先要清楚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

的态度对待文化。在对“哪些行为可以表现为文化自信”的调查中,189人选择“时时关注中华文化传播,了解文化宣传政策”,187人选择“积极争当宣传者,身体力行传播中华文化”,180人选择“对恶意贬低中华文化的言行加以制止并纠正错误观点”,151人选择“积极参加国学、戏曲等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反映出多数干部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具有较强的文化担当意识。

(五)对如何推动树立文化自信认识较为全面。推动树立文化自信,重要的一环是必须找准制约文化自信的因素,并有针对性地发挥各种积极因素。在回答“当前影响文化自信的主要问题”时,182人选择“对中华传统文化认识不够”,163人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对西方文化存在片面好感”,166人认为对“革命文化的学习存在淡化和虚化的问题”,177人认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掌握得不系统、不深入”,在问及“如何解决文化不自信”时,206人认为“应积极树立民族文化创新意识,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189人认为“进行社会实践,主动学习发展中华文化”,195人认为“通过教育培训、各类文化熏陶,加强文化修养”,155人认为“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以发展中华文化”,通过综合分析,反映大部分受访干部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及发展制约因素有比较准确的认识,能够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

二、教育培训如何使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是民族的立身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也必然深深植根于广大干部心中。党校、社院等干部培训机构要善于从教学需求和学习心理入手,切实发挥好作用,唤醒激活这种文化“基因”,使领导干部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

一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化培训。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也有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方面是文化自

信的根源,也是干部教育培训强大而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在回答“希望在干部培训中安排哪些中华文化方面的课程”时,186人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50人选择“中国近现代史”,138人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15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112人选择“革命传统教育”,105人选择“领导艺术与科学决策”。

从这些选择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受广大干部欢迎。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该尊重这种需求心理,优化师资力量、挖掘文化内涵、强化文化体验,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员头脑。同时,这些选择也反映出一些受访干部侧重于对某个领域的学习,而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效应。这需要社会主义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工作中统筹兼顾,把握好增强文化自信的着力点,打出“组合拳”,大力弘扬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文化”。

二要注重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培训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一项基本工作。如何认识、把握和运用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直接关系到文化自信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在针对“哪种教学方法更利于提升文化自信”的调查中,211人选择“现场教学”,177人选择“课堂教学”,171人选择“案例分析”,117人选择“座谈交流”,115人选择“情景模拟”,89人选择“结构化研讨”。调查反映出广大受访干部对满堂灌式的教学组织形式认可度不高,希望能够灵活安排,通过把课堂教学、现场教学等培训形式有机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立体化融入到教育培训全过程。现场教学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实践养成的重要途径。在回答“去哪种类型场馆开展现场教学更会激发文化自信”的问题时,178人选择“革命传统教育基地”,173人选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4人选择“历史博物馆”,157人选择“国情市情教育基地”,152人选择“先进制造业基地”。虽然受访干部对现场教学地点的选择比较均衡,但是,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根据不同的

培训对象和培训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教学,确保取得培训实效。

三要切实提供优质师资保障。开展干部教育培训,优秀师资是重要保障。对于师资的选择,172人选择“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党政培训机构的专家教授”,185人选择“高校教授或知名专家”,176人选择“各行各业先进人物”,79人选择“党政领导干部”。这个结果反映出广大受访干部对各类党政培训机构、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各领域先进人物的授课效果比较认可。对于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来说,受访干部的肯定,既是压力更是动力,要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和全面提升教师理论素养和科研水平,努力帮助教师熟练掌握和运用好各种教学方法,积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提高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同时,选择“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数较少,也应该引起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高度重视。在邀请党政领导干部授课时,要从提高培训实效出发,积极邀请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通过言传身教真正帮助培训对象解决工作难题,提高思想认识,培树文化自信。

三、对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工作的基础性思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自身文化发展进程和生命力的坚定信念。^[1]社会主义学院等各类党政培训机构不断强化责任担当,积极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尤其需要挖掘好文化的内在价值,注意做好相关教育培训的基础性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系统完备、逻辑清晰的文化自信培训体系和教学工作实现路径。

(一)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价值取向决定了教育培训工作的方向,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此唤起干部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同时,要不断完善教育培训评价体系,及时对教育培训给予方向指引和动态调节。一是坚定不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最深

层次要素。是文化自信的灵魂。”^[2]面对各种思想交流碰撞及社会思潮的影响,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首先就是要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自信的观念形成和共识凝聚。二是要以经受实践检验为价值评判标准。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要立足解决现实问题,积极回应时代需求,努力把教育培训成果转化为促进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精神财富,能够始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三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精神实质。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决不能走向形式主义的误区,要通过努力挖掘其深厚的资源,不断汲取其精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验与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必须坚持积极的教学导向。开展干部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工作,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理清坚持什么样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党校姓党”“社院姓社”的政治原则,不断加强和改进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努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一是要严明教学科研工作纪律。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坚守工作纪律是干部教育培训的灵魂所在,也是发展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对各类培训对象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社会主义学院等各类党政培训机构应该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牢牢掌握教育培训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二是坚定正确的学术方向。对于教育培训组织者而言,教学科研工作要始终自觉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并将其贯彻于教学科研工作始终。对于每一位教学科研工作者而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教学和研究,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真正阐发好中华文化理论精髓和时代意义。此外,要积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贯穿文化自信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确保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学术科研工作始终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理论立场。

(三)必须坚持全面的创新导向。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新形势下的干部教育工作尤其要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全过程,努力探索有利于增强优秀文化宣讲活力、有利于破解先进文化传播难题的新办法、新举措和新载体。一是要创新发展文化自信教学体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既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也蕴含了丰富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核。因此,必须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文化自信教学体系,配套地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培训工作。二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项最为基本的工作。任何干部教育培训任务最终都要通过具体的教学方法来实施。好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生动有效地传授理论和知识,还能够极大地调动被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首先是必须巩固课堂教学主阵地。文化自信课堂教学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加强中提升,努力满足广大干部的需求和期待。其次,要不断创新交流平台。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文化传播所遭遇的压力,并不是文化本身的危机,而主要是传播形式上的困境。立足这一点,要大胆探索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将之与流行文化元素和新技术相结合,积极开辟有利于先进文化发展、传播的途径、载体、平台。

参考文献:

- [1] 韩震. 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兼论文化自信[N]. 光明日报, 2011-10-16.
- [2] 燕爽. 以文化的自信建设自信的文化[J]. 求是, 2017(8).

编辑:王芳

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

——以中国足球为例

龚智敏 张彦

摘要:针对当前的足球改革现状,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振兴中国足球必须抓好的三件大事:第一,自毁长城的历史教训可谓刻骨铭心,端正理念就一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不动摇,但一定要懂得道法自然并学会制度驾驭;第三,中国体育大环境一定要造就回归体育发展本身的新制度生态,以校园足球为抓手两条腿走路,这也是遵循足球发展规律使然。

关键词:足球改革;顶层设计;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1-00078-03

当前中国足球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如何顺利推进改革成了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就需要用顶层设计高屋建瓴,遵循客观规律,完善制度机制,打好群众基础,方能涉过道道险滩,抵达胜利的彼岸。

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以“摸着石头过河”来不断探索,涉过道道险滩,中国改革才闯出了今天这番新天地。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于我们掌握真理有巨大价值,那么今天当中国改革由浅水区步入了深水区,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如果“过河摸不到石头”那该怎么办?正是理性高度的这一思考,“顶层设计”问世并逐渐凸显其意义。顶层

设计乃是中国改革渡过深水区能胜利抵达彼岸必须要掌握的另一种方法论。

毫无疑问,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因为顶层设计旨在为从无序走到有序而创建或变革某一项制度。顶层设计是以制度建设为依托的,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顶层设计。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已产生的制度可谓成百上千,它们无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但是作为人之设计产物的制度并非都能与顶层设计挂钩。因为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并非都能很好实现社会整合,它们有优劣之分或者成功与失败之分。邓小平曾有这样的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所以顶层设计的制度固然是人之设计的产物,但是作为人

收稿日期:2017-10-09

作者简介:龚智敏,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彦,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之设计产物的制度只有是好的、成功的,才能与顶层设计挂上钩。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讲究顶层设计,首要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历史上曾经有的那么多好的、成功的人之设计,与我们如今要讲究的顶层设计又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在于:今天我们在解决现实问题而对一项制度进行人之设计时,第一,我们已有了对历史经验的清醒认识,即我们认识到一项制度并非建立起来就行,它有可能搞不好,它有可能失败或失灵;第二,我们认识到建立一项制度如果要是好的、成功的,人之设计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对客观规律的充分把握。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究顶层设计,就要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说清楚顶层设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者,它使我们眼明脑清,对所有领域(包括经济领域、金融领域、体育领域)的制度建设都有不失一般性的指导意义^[2]。现在在中国众多领域制度建设中,顶层设计的提法已经频见报端,但是由于还缺少自觉以唯物辩证法做指导,“顶层设计”名不符实,有不少都沦为了一种时髦的新概念而已。

有了上述考量,本文可以给顶层设计下定义了:顶层设计旨在制度建设,它必定是高屋建瓴的人之设计,也是对人之设计的优劣和成败有了自觉认识的人之设计,更是有正确出发点和对客观规律有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具有前瞻性的人之设计。

二、高屋建瓴与出发点正确

顶层设计固然是不同于过去的人之设计,但高屋建瓴对它也同样少不了。这就意味着,对于高屋建瓴,制度建设如今适用的新概念即使换成了领导层或管理层,同样存在着一个如何集中或如何使用公权力的问题。“出发点正确”是我们今天顶层设计要讲清楚的第一条。制度建设对于领导层或管理层来说,“出发点正确”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否则,高屋建瓴就会走进误区,顶层设计也就谈不上了。对此,中足联赛的教训可谓深刻。

本来中足职业联赛是国人对振兴中国足球寄予厚望的一项开先河的体育改革制度,它所创造的球市曾经火爆。但是吹黑哨、踢假球等频频发生

后,广大球迷渐渐发现,这个制度在冠冕堂皇下,其“高屋建瓴”大有猫腻。起初人们还以为只是制度粗糙不健全,所以在大声疾呼的同时纷纷献计献策。但后来球市越治越乱,终使人们发现事情绝非打补丁那么简单。祸根是中足联赛的名次挂帅,一切围绕着输赢转,致使制度的篱笆漏洞百出,公平竞争的体育比赛精神全成了摆设,特别是为权钱交易大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制度是高屋建瓴的产物,当然制度的健康运行也离不开领导层或管理层在监管上的作为。但监管同时意味着权力的介入,这就对顶层设计首当其冲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好的制度一定要能厘清权力的边界:管理或者管辖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关键在于管理或者管辖必须与利益关系完全切割开来:领导者或管理者是制度的营造者、制度的实施者,但绝不能成为制度的利益关系者。

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制度建设,出发点正确是顶层设计要做到的第一条。“出发点正确”是人人都能懂的通俗说法,上升到世界观高度就是顶层设计对于制度的建构者、实施者来说,首先要解决好宗旨、理念和价值观问题:为公而不为私。打铁还需自身硬,不管在哪个领域要建立哪项制度,概莫能外。在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中,即使有部分社会成员承担着领导者、管理者的角色,那他必定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这种双重身份的“镶嵌”关系,使任何一个领导者、管理者也脱不了有个人利益。高屋建瓴离不开杜绝私心杂念,在顶层设计中这不是空的而是实的,这就是我们在强调管理者自律的同时,强调要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对此,顶层设计的视野是“治标”更要“治本”。即要通过制度好形成一种机制,来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和不想腐的转变。而“治本”落地,“公不济私”和“透明化”则是必须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公不济私”划定了管理职能的边界。具体到中超、中甲,足协只应该成为联赛的制度建构

者、环境营造者、规则维护者,而不应该成为球市的利益关系者。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足协的主要任务是给繁荣中国足球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以保证公平竞赛和球市的健康发育。“管办分离”的实质就是要在制度上做到“公不济私”,只有与利益彻底切割开来,管理职能才能回归本位,一心扑在振兴中国足球事业上,足协才能重拾公信力。

第二,“透明化”要求杜绝暗箱操作,打造“阳光赛制”。例如在裁判黑箱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来防治腐败,如不说是不可可能的,那也必然是代价高昂的。而透明化背景下的赛制治理变革,旨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就釜底抽薪地阻断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通道。

四、道法自然与制度驾驭

应该指出,顶层设计是理念和能力的统一。能力充分,理念错了不行;理念正确,能力不足也不行。在本文前面关于顶层设计的定义中,自觉遵循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已经被点明和强调。顶层设计断不了也是人之设计,但拍脑袋、想当然绝不是顶层设计。由于顶层设计对过去人之设计的优劣和成败有事先的充分认识,对自身人之设计的优劣和成败也有事中的反复推敲,所以我们在用它来进行制度建设时,一定要做到周密、道法自然和防患于未然。

对于社会整合,领导层、管理层要推出一项制度,制度总是可以建立的。但单凭主观意愿和意志出台制度,难免会顾此失彼。所以顶层设计一定要“周密”。比如反腐防腐,制度的藩篱要健全不留死角。行贿的问题、受贿的问题、变相的问题、私下的问题等等,统统要考虑到。而俗话说“百密难免一疏”,何况事物又无不处在变化之中。所以对于未尽之处,顶层设计还要能“防患于未然”。比如一个成熟的赛制如果突遇踩踏事件怎么办?要有应急响应的事先安排及演习。不过在方法论上,顶层设计的核心还是在于“道法自然”。换言之,只有靠机制来运行的制度才是真正好的制度、有效的制度。

对此,我们必须从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历史大背景来看待中足联制度的重生。即任何一种经济要有活力,都少不了市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承认竞争、鼓励竞争。市场经济不是靠权力来运作的,而是靠机制来运行的,故市场作为效率的源泉,有“无形手”之称,这就昭示了“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不仅意味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也意味着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事实上,体育同经济、金融、教育等一样,都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有机系统,如果我们沿袭过去权力处处插手的传统做法,企图对每个元素的活动都加以跟踪和指导,那是连神仙也做不到的事。

应该指出,在顶层设计的视野下,与道法自然相适应的管理方式不是权力运作而是制度驾驭。制度驾驭的着力点既不是“运动”也不是“包办”,而是要通过造就一个好的制度生态,让身处其中的每个成员、每个单位以其向好、向上、向优的自觉性来实现系统整合。在顶层设计中,制度驾驭和机制运行两者相辅相成,它们共同构成了顶层设计方法论的内核。

在这方面,足协当前及以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要像维护眼睛那样维护足球比赛的纯洁性。第一,打铁还要自身硬。足协必须带头执行制度、维护制度、完善制度,决不能重蹈自毁长城的覆辙。第二,当好制度的守门人。足协必须依法办事,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对于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以及“假、赌、黑”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第三,造就回归体育发展本身的新制度生态,立足长远,以校园足球为抓手,培育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唯其如此,足球运动的“春天”必将到来。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郑原.顶层设计——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J].理论月刊,2011(4).

编辑:王芳